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5 年 4 月 30 日第 49 期

本期目录

【“破四旧” 专辑】

故纸堆

新华社为“破四旧”作舆论引导的三篇报道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致全国革命职工紧急呼吁书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紧急通知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全国通令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改香港地名的通令

云南党史记载的“破四旧”

山东党史记载的济南“破四旧”

四川党史记载的成都、乐山“破四旧”

武汉党史记载的“破四旧”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天津市有关发还查抄物资的几份资料

关于发还李永章查抄物资工作情况报告

对查抄物资退还的认识

关于梁维太所查抄物品发还报告

梁维泰对发还查抄物资的认识

庞国义录入、提供 文革中重庆市两份更改地名通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

本区已改街道（地）、单位名称的通知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使用整顿后的街名的通知

生逢乱世

唐勇康 上海“破四旧”亲历

王坚勇 爱在风雨夕

孙丹年 回忆被抄家时的意外一幕

昨日心迹

高致贤 贵州老高日记（摘录）

书海泛舟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在北京“破四旧”的恐怖日子里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选读）

王荣方 乡村里的“破四旧”（《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选读）

编读往来

王立嘉谈 48 期

萧白杏谈 48 期陈闯创文

庞国义谈陈闯创的疑问

【“破四旧”专辑】说明

“破四旧”，又叫“大破四旧”“扫四旧”“横扫四旧”，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提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于是，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乡村，各级官媒喝彩叫好，各地党政机关推波助澜，并由基层公安派出所、街道居民委员会提名带路，让狂热单纯的青少年充当急先锋，首开文革中“打、砸、抢、抄、抓”的先例，在全国掀起了以“破四旧”为名的“红色恐怖”。终于使“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大改变”……

对这场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浩劫，至今缺少详细的统计、记载，更缺乏认真深刻的研究、反思。本刊特编此专辑，希望能给有心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故纸堆】

新华社为“破四旧”作舆论引导的三篇报道

按：这三篇报道原载 1966 年 8 月 26、27 日《重庆日报》，是当时新华社发出的全国各大报均得转载的通稿，中央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均有转播。正是在这样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下，“破四旧”之风迅速席卷了全国城乡。

广大工农兵坚决做红卫兵强大后盾扫荡一切剥削阶级腐朽遗迹

共庆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二十五日电 首都和各地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连日来，许多地方的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并肩战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遗迹和旧习，共同欢庆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胜利；他们互送毛主席语录、贺信和喜报，相互鼓舞，相互激励。许多革命职工和贫农下中农还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反得对，反得好！他们表示，要坚决站在革命小将一边，做小将们的强大后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右图：《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合刊登载的新华社照片。文字说明是：在以红卫兵和其他革命青少年为急先锋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上海海关大钟清除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报时音乐，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上海黄浦江两岸的许多工厂，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口、过道上、车间里贴出了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有些工厂还派出代表，上街和革命师生一起横扫“四旧”；有的厂职工还给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小将送去支持信。工人们组成的厂内宣传队，到各个车间，张贴革命标语、大字报，进行宣传，提出了彻底扫除一切“四旧”的战斗口号。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杨富珍、姜林根、王林鹤、孟德和、祁志超、程德旺、陈阿发等，有的是在“五卅”斗争中和帝国主义者直接搏斗过的老工人，有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和积极分子，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闯将。他们一致指出，革命小将们向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猛烈的冲击，大快人心，干得好！一千个应该！一万个应该！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次彻底埋葬旧世界的伟大的“人民战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灭资兴无“大会战”。三十多年前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杨树浦发电厂老工人姜林根十分激动地说：“要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就得有红卫兵这样的革命气魄。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战无

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我们的武器，我们力大无穷，什么也不怕，一定可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天津市广大革命职工纷纷贴大字报，写支援信，举行集会，上街游行，自己动手砸碎一切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的旧招牌，破陈规陋俗，决心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津铁路工人文化宫的革命职工们，根据革命学生的建议，摘掉了“宁园”的旧牌子，改名“二七”公园，受到革命学生和职工的欢迎。已经改了新名的“正阳春”饭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建议和鼓舞下，进一步发扬了革命精神，奋战两天一夜，扩大了受劳动人民欢迎的快餐部。天津色织三厂老工人、五好职工秦华兴奋地说，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一切资产阶级的黑货，就是要统统打倒，统统砸碎！革命小将们一马当先，向旧世界宣战，大大长了所有革命者的志气。

在武汉，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行动，纷纷起来闹革命。震寰纺织厂二十四日正式换上了东风纺织厂的新厂名。这个新厂名是在红卫兵商议下改换的。这个厂的纺织工人热烈地称赞说：“红卫兵的倡议好得很！我们不能再让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威震寰球，我们要彻底砸碎这个旧制度，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东风吹遍全球，让东风压倒西风。”武汉美术厂革命职工还组织了“破旧立新服务队”，带着各色油漆，到处帮商店写新招牌，以实际行动支持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武汉重型机床厂二十四日举行了支持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集会，各车间、各科室的革命职工都满腔热情地给革命小将们写了支持书、声援信。八十高龄的“二七”老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敢死队队长张士汉，看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兴奋地说：我们当年参加“二七”大罢工，赤手空拳地同反动派斗争，什么都不怕。今天我看到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非常钦佩。我们对我们的后一代完全放心。

重庆钢铁公司今天举行了有一万多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热烈欢呼革命学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表示坚决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人出身的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说：我们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尽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革命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大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完全代表了我們工人阶级的心愿，我们决心大力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各地广大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也对红卫兵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受尽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欺压，我们最懂得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的伟大意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合我们的心意。英雄刘英俊的母亲、贫农社员朱秀兰说：“革命小将们，你们干

得好！我们贫下中农都支持你们。刘英俊活着的时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痛恨旧世界，他是向‘四旧’开火的冲锋猛将。旧世界必须打破，新世界一定会建立起来。我们工农兵眼睛雪亮，我们坚决支持革命小将，彻底打倒资产阶级顽固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连日来，乌鲁木齐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高举着标语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表示坚决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破旧立新，彻底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红旗公社园艺场一个维吾尔族老贫农说：我们园艺场所在地原名叫“八家户”，解放前是几户地主、富农横行霸道的地方。解放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当家作了主人，今天在革命小将的鼓舞下，我们把这个封建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地名改成了“工农兵新村”。大家一致欢呼：改得好！

昆明郊区官渡区联盟公社桃源大队小菜园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和小将们一起，把村前的石狮子推翻了。他们说：我们推翻的不是一只石狮子，而是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他们和队里的贫农下中农社员一起把“小菜园”的村名改为“革命新村”。全队六十四户社员的家里都贴了崭新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大家喜气洋洋地表示：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老贫农、黑龙江省贫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郊区新发人民公社副社长胡连海听到红卫兵破旧立新的胜利消息，心里热呼呼的，一夜也没睡好觉。他把喜讯传给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并且把过去用封建地主名字命名的村名，改成了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字。他一再表示：造资产阶级的反，好得很！贫下中农坚决做革命学生的后盾，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拉萨市郊拉鲁乡的翻身农奴，听到首都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以后，决定改换新乡名。他们说：西藏是我们翻身农牧民的天下，绝不能再让叛国头子拉鲁的名字继续玷污我们的乡村。团支部书记、贫农仓决说：首都革命学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尖兵，向一切封建迷信、陈规陋俗开火，把我们的家乡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新华社北京二十六日电 连日来，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纷纷开座谈会、写信、写文章，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他们说：红卫兵戴红袖章，我们戴红领章，最高司令、最高统帅都是毛主席。我们一定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团结战斗在一起，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们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猛烈攻击的革命精神和行动，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赞扬。某部战士们写诗赞道：“做得好，做得对，把旧世界彻底来砸碎！亿万工农兵齐欢呼，毛泽东思想万万岁！”

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邓阳升在写给报社的文章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完全体现了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愿望，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他们做得对，干得好！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刘英俊生前所在连队，在写给北京红卫兵的信中说，你们用革命的铁拳猛砸封建主义的残余，用革命的铁扫帚横扫资本主义的毒菌，用革命的大刀阔斧猛砍修正主义的老根！使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你们做得太好了，你们的革命行动，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我们以刘英俊同志的亲密战友的名义，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许多红军老战士，还以他们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完全正确，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他们说，没有当年革命人民的造反，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新社会；同样，没有今天革命群众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造反，就不能彻底摧毁旧世界！大破大立，只有彻底破除“四旧”，才能真正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建立起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某部红军老战士王世安的文章中写道：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老一辈的革命者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今天，红卫兵小将们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和行动，正是老一辈革命者的革命造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许多部队指战员在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时，还结合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某部副班长孟文学在座谈会上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糟得很”和“好得很”是两种阶级对待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革命学生猛烈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是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牛鬼蛇神大叫大嚷“糟得很”，但是，在革命者看来，这正是“好得很”！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五好战士周世仁说：“从表面上看，革命小将们砸碎的是旧招牌，但它破坏的是一种旧思想，而在‘破旧’的过程中，新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起来了。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广大指战员们还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学习十六条，以十六条为武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阵地，永远高高飘扬。



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向一切剥削阶级“四旧”猛烈开火

新华社北京二十五日电 首都“红卫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强烈地鼓舞着各地“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燃起了横扫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等反动腐朽势力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燎原烈火。“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搬掉一切绊脚石，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的战斗目标。

据来自各地的消息，连日来，许多城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的大幅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散发革命传单，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右图：《人民画报》1966年第



11—12期合刊登载的新华社照片。文字说明是：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一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意识的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北京“亨得利”钟表店的革命职工，一九六四年以来曾经两次提出改掉老字号，但是由于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阻挠，这个要求一直没有能实现。现在，他们和革命小将共同行动，彻底砸碎“亨得利”这块散发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臭气的招牌。）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短短几天之内，各地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旧店名、旧街名就被迅速扔进垃圾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许多陈规陋习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批批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和革命精神的新店名、新街名、新校名诞生了，许多符合广大工农兵利益的革命措施开始实行。资产阶级威风扫地，革命群众扬眉吐气。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到处

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祖国各地。

杭州、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郑州、合肥、南京、福州等地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倡议下，杭州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店名、厂名、街道名和西湖风景区的名称，已经被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所代替。以宋代封建文人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西湖苏堤，都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六家以“张小泉”这个旧店主的名字作为招牌、并且一直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剪刀店，都换上了“杭州剪刀店”新店名。广州的革命小将们在街道和商店贴出许多大字报和宣战书。他们指出：广州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绝不容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继续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城市。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革命职工，把康有为手书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了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在革命小将的倡议下，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已改名为“广州柴油机厂”。这个厂的老工人说：过去资本家取“协同和”这几个字作厂名，就是想协力同心地压迫、剥削工人。这块反动的标记一天不去掉，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莫大耻辱，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南京市中央商场”这块标志着国民党滔天罪恶的臭招牌，现在已被革命职工当众砸烂。职工代表当着“红卫兵”们激动地说：毛主席说得对：“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南京许多理发馆、服装店、鞋帽店、浴池等单位的革命职工，热烈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要狠狠地打，都要狠狠地造它的反。武汉市根据“红卫兵”的倡议，改换了一大批带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商店和街道名称。一些商店门口的对联上写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砸碎砸烂砸绝根，革命精神造反精神大立大兴大发扬”，横额是：“好得很”。合肥的“红卫兵”们在逍遥津公园贴上了革命大字报。他们说：有资产阶级的逍遥，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建议把逍遥津公园改名为红色公园或革命公园。

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广大革命师生，到处倡议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旧街名、旧店名统统废除。随着帝国主义在我国铺设中东路而设立的哈尔滨“秋林商店”，已经改名。在以哈尔滨大资本家武百祥的代号命名的“同记商场”，广大革命职工砸掉了悬挂六十年的黑招牌，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店名。沈阳市的革命小将在给原“福祿寿食品商店”贴的大字报上写道：“福祿寿”这三个大字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射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支大毒箭，它“号召”人们为“福”为“祿”为

“寿”而奋斗，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让它继续放毒了。这个商店的革命职工，热烈响应革命小将的倡议，立即砸掉了福禄寿的旧招牌，换上了“国营立新食品商店”的新名字，并且从橱窗里清除了宣扬封建迷信的寿桃。

在成都、南宁、贵阳等地，革命学生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沿途张贴“向旧世界开火的檄文”，倡议革命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四川大学革命学生宣传队表示要坚决砸碎黑招牌，踢开绊脚石，让古老的成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然一新！昆明市近日公园百货商店的革命职工听到首都“红卫兵”革命精神的广播以后，纷纷议论：“近日公园”这个名称来源于封建朝代的“近日楼”，应立即改革。这个商店的团总支书记、曾经和匪徒搏斗而失去双手的女英雄徐学惠说：我们不但要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名称，而且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连根挖掉。南宁一些革命师生在闹市区宣读了倡议书，要求把每条街道、每个商店都办成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他们当场教过路的群众唱自己编写的歌曲《举起革命的铁扫把》。在称为“荣宝斋支店”的“邕华斋”前，革命职工去掉旧招牌，挂上了“把商店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大横幅。围在商店前面的革命群众读了新贴出的对联：“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学了心里亮堂堂。翻山越岭不迷路，大风大浪知方向”，一起欢呼：“毛主席万岁！”

河北省、山西省革命小将和广大职工“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正在继续扩展。各地革命群众人心大快，喜气洋洋。开滦煤矿的广大革命职工提出坚决砸烂帝国主义遗留下的“开滦”煤矿的旧牌匾，更换官僚资产阶级用来统治工人的旧“工牌”。工人坚决主张改“工牌”为“工作证”，并在煤矿门前，贴出了更改煤矿名称的倡议。

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西宁，革命小将在大字报里写出了他们彻底革命的决心：“不破旧誓不罢休，不立新死不瞑目，造反有理！”呼和浩特麦香村饭店的革命职工早就不满意这个老字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饭店职工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要砸碎旧招牌。他们这个革命愿望这次在“红卫兵”协助下终于实现了。当他们把“工农兵食堂”的新店名张贴在门口时，过路的革命群众都欢呼“改得好，改得对”。乌鲁木齐市“红卫兵”小将们在主要街道的墙头上，也贴出了许多充满革命豪情的宣战书。宣战书中写道：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乌鲁木齐是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乌鲁木齐，绝不允许有任何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存在。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的墙壁上，贴着“红卫兵”和各族革命群众的许多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写道：让那些长期把持文艺舞台的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胆战心惊、统统滚蛋吧！工农兵统治舞台的历史潮流不可

阻挡，社会主义舞台我们工农兵是占定了。

目前，这个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涤荡着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们表示：一定要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一定要打得一切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一定要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根子和修正主义的温床，一定要使每条街道、每个行业、每个工厂、人民公社、商店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代红！



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横扫“四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

据新华社北京二十六日电 首都和各地红卫兵们带头掀起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更广泛地得到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各地工农群众和红卫兵们并肩战斗，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攻击，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巨大洪流，任何顽固的旧势力都将被这股洪流彻底冲毁，妄图阻挠这股洪流的一切牛鬼蛇神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气势磅礴的横扫“四旧”革命风暴，连日来席卷了全国各城市。广大红卫兵和工农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乘胜前进，扩大战果，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臭根子和任何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江苏无锡、徐州、苏州、常州、南通、镇江、扬州等市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们，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职工砸掉了挂了九十多年的老招牌，换上了“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街道上群众纷纷鼓掌欢迎。这个店的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校名改为红卫兵小学。南通唐闸大生一厂职工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攀上厂门口的钟楼，把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张謇题的“大生一厂”四个字全部凿掉，改名为南通市第一棉纺织厂。镇江脱粒机厂职工开着宣传车上街，配合红卫兵们进行破“四旧”、立“四新”的宣传。

在英雄城市南昌，“黄庆仁药栈”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

拿起铁锤砸掉了挂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和对面“兴无”商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招牌。“阳明路商店”的革命职工，砸碎了为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王阳明招魂立碑的店名，换上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商场”的新招牌。当红卫兵们把沿用资本家招牌的“东南商店”改名为“东风商店”时，商店里、街道上顿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人们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东风压倒西风！”

在南昌市郊的原“湖坊”公社，二十四日有三千多名贫农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顶着烈日，高举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捧着决心书，举行了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大会。大会决定废除“湖坊”旧名，改名“东方红”人民公社，以实际行动响应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创举。

横扫“四旧”的革命浪潮，近日来席卷了东北边疆吉林省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地处长白山区的通化市各中等学校，出动了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旧招牌，改换了一些街道的名称，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白城市国药二店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帮助下，砸碎了广生堂门前挂了三十二年的两个葫芦招牌，这两个招牌原来是大资本家挂起来的。吉林市革命小将们发出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这个市的“福源馆”食品店在一些革命小将们的帮助下，砸碎了一百多年的旧牌匾。在长春市，革命职工还专门为红卫兵们设立广播站，让他们发表演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河南，洛阳、开封、新乡、安阳、焦作、鹤壁、许昌等市的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向“四旧”发动了猛烈攻击。洛阳市在解放后新建的影院、剧院、公园和新修的道路都以封建时代的遗址命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广大工农群众和红卫兵将们，对这种状态再也不能忍耐，他们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老爷们拿劳动人民的革命成果，去为帝王将相竖碑立传。王城公园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们的鼓舞下，敲锣打鼓地把公园的名称换成“劳动人民公园”。在开封市，许多商店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并肩战斗，砸烂了一些商店的旧招牌、旧装饰。元隆、义丰厚商店和王大昌茶店等革命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动手砸掉旧招牌，换上红光闪闪的新招牌的时候，职工们激动万分，齐声高唱《东方红》歌曲。在焦作市，革命小将们和革命职工一起为一些理发店改名的时候，店门前掌声、欢呼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昌市的革命群众把一户门上卖国贼袁世凯题的“清正廉明”匾打翻在地，人们都说反得好，砸得对，人们热烈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乌鲁木齐街头这几天到处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许多商店里都在非常醒目的地方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挂起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红色布标，柜台内外张贴了无数破旧立新的大字报、决心书、倡议书。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招牌，换上了“工农兵”、“革命”、“文革”、“抗美”等富有革命意义的新牌号。一些饭店、旅社的各族革命职工，大破陈规陋俗，大立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工农兵餐部（原“鸿春园饭店”）等饭店的广大革命职工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开始向顾客大量供应价廉味美饭菜，受到群众欢迎。

拉萨市街头这几天也沸腾起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数百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扛着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敲锣打鼓走向街头，大破“四旧”。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在宣战书中说，拉萨市解放十几年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三大领主设下的精神枷锁还牢牢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实在



容忍不下去了！现在应是清算他们的时候了！拉萨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倡议给带有封建农奴制和迷信色彩的地名、街名、房名改换名称，倡议文艺单位禁演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戏剧等等。拉萨市广大工农群众纷纷表示誓做红卫兵小将们的坚强后盾，为把拉萨市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城而并肩战斗。（上图：《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合刊登载的新华社照片。文字说明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各民族的红卫兵和其他

革命群众，怀着对封建农奴制度、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烈仇恨走上街头，在拉萨市大闹革命。他们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许多旧街名、地名和单位名，给这些地方换上了革命的新名称。这是他们把原西藏反动地方政府命名的“门孜康”（医算局）改名为“劳动人民医院”。）拉萨城关区三百四十多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听到红卫兵小将们上街大闹革命的消息后，激动得跳起来，第二天，他们就走上街头，和红卫兵们一起闹革命。今天，拉萨市郊区堆龙德庆县六个乡的翻身农民，派出二百八十人的一支队伍，高举着毛主席像，手捧毛主席著作和刚收获的青稞穗，来到拉萨中学声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他们表示，翻身农民们坚决和革命学生站在一起，彻底抽掉一切封建根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晓文下载、提供）

【故纸堆】

致全国革命职工紧急呼吁书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按：原件为铅印传单。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主席还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这些果实应该由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来享受。

可是，现在，在全国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老爷们，那些整天逍遥自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狗崽子们，拿着人民的血汗肆意挥霍。他们整天游街，上馆子，进戏院，穿的是奇装异服，住的是高楼大厦，坐的是小汽车，他们有的是手表、收音机、自行车……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比起这些人来真是太悬殊了！这是不合理的制度，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刺激素。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汹涌澎湃，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不能容忍了！绝对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我们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彻底砸碎这一不合理的制度。

1. 取消定息，取消保留工资，调整高工资，缩短工资差距。
2. 一律取消“教授”“讲师”“工程师”等学衔，同时取消由这些衔头而造成的一切特权和照顾，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3. 取消一切为资产阶级“贵族”“少爷”“小姐”服务的行业，例如“美容院”“古玩店”“珠宝店”“西菜社”“高级饭店”等等（除为外宾、华侨服务以外）。一切服务行业，应面向工农兵，成为为革命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企业。
4. 取消或降低稿费，砸烂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个人奋斗的“通天梯”。无产阶级要夺回舞台，茶馆，公园等宣传阵地，电台、广告、霓虹灯，绝对不能

做商业广告，应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战斗前哨。

5. 分布在最阴暗角落里的一切私人医生，教师，画师，乐师，是一堆散发着资本主义腐朽气息的垃圾，必须彻底扫除，打断这条通往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6. 呼吁在一切宗教机构附近，大力宣传无神论，捣毁天主教堂，把上帝、菩萨搞得臭臭的，绝不能让他们胡作非为。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我们热切希望全国的工矿企业、商业、服务行业的广大革命职工响应我们的号召，同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向资产阶级猛烈开火！革他们的命！在这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子，保持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纯洁性，以便加速和保证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最高统帅、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船舶修造学校革命串联队重庆分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请翻印请张贴

【故纸堆】

紧急通知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按：原件为油印传单。原件中的掉字加在黑色方括号里。

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举起铁扫帚横扫“四旧”灰尘，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我们全体革命干部最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和行动，广大红卫兵关于取缔单干户的革命要求和行动，我们最坚决拥护和支持，我们决心和红卫兵一道把单干户彻底取缔、打垮。为此，向全市工农兵、革命干部，向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业、街道发出如下呼吁：

一、全市革命学生、职工、机关干部、广大群众，对你们家属亲友从事个体户有照无照的商贩，修配服务行业，从事小手工业经营的业户，应积极动员立即

停止经营。

二、从今天起我们税务局中革命干部坚决不给单干户开发货票。

三、国营、手工业、生产社、集体、机关、事业等单位以及市民，一律不购商贩商品，不找商贩加工、修配物品，并且积极监督和检举商贩违章经营和不法行为。

四、对无证商贩严加取缔，对农副产品禁止自行出售，纳入国家轨道。

五、凡对商贩个体供货单位，从即日起立即停止供应。

六、凡个体商贩、亲友随从经营，而本人有劳动【能力】的，商贩本人应即停用，让他们上山下乡。违犯者，格处勿论。

七、凡个体商贩本人有劳动能力的，应立即停业，于三日内办清歇业手续，提出上山下乡申请。

天津市税务局河北区分局四科全体革命干部
河北区煤建分公司翻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卅日

【故纸堆】

全国通令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按：原件为铅印传单。

毛主席语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

自行车制造厂、汽车制造厂，以后车牌不能再叫什么“飞鸽”、“永久”、“双喜”、“白山”等带有封建意义名字，应该叫一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名字。以后再制做各种车辆时，要一律设置毛主席语录。出售自行车和各种车辆时有关部门如没设置毛主席语录前，一律不出售，设置毛主席语录后才能出售。

(二)

八岁以上大人小孩都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同志们和其他革命同志，可在街道查问过路人，如果他们连一条主席语录也说不出来，那么，不论他们有什么急事，红卫兵同志，必须负责教会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背会几条以后才能通行，力求活学活用。

(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移风易俗，为此特发此令通令全国，取消什么“端午节”呀！“中秋节”呀！“春节”呀！等封建传统节日，和“满月”呀！“寿辰”呀！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

(四)

要减少烟酒企业。消费者要买烟酒之类，要有集体单位介绍信。各商店有关同志，在出售烟酒之类的时候，要负责向消费者讲清利害，劝他们戒酒戒烟。

(五)

各单位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将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以便让群众识别，使牛鬼蛇神威风扫地。

以上通令如有违反者，当地“红卫兵”革命群众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处理。
以上通令希见后立即翻印。

山西省太原市东方红矿机中学“海燕”革命战斗小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故纸堆】

改香港地名的通令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按：原件为油印传单。原标题只有“通令”二字。

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 令

香港改为驱帝城。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迎头痛击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形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变整个社会精神面貌，把社会推向前进。

香港是我国领土，帝国主义长期侵占着它，企图利用香港作为侵略我国的跳板，我们坚决不答应。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征服人心，达到复辟阴谋，为此，我们杭州电信局红卫兵通令全国各地：凡寄发香港的电报、信件、邮包等，地名一律改写为：驱帝城。否则一律绝收（注：原文如此，应为“拒收”）退回。特此通令。

革命造反有理！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杭州电信局红卫兵

延安（开元）初中 2—5 翻印组翻印

一九六六·九·二十二

【故纸堆】

云南党史记载的“破四旧”

按：本篇摘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纪实》（内部资料），2005 年。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66年）在大串连活动中，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开展了破“四旧”的活动。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舆论的误导和“造反有理”的煽动下，破“四旧”实际上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历史遗产、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寺庙殿堂、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大冲击、大破坏、大扫荡。地处边疆的云南受害深重，大批珍贵典籍、古玩、书画被烧毁捣烂，许多街巷和“老字号”名牌商店被强行改名，服务群众的茶馆、私人诊所被查封，仅昆明就有430条街巷和数以万计的商店被改名，96个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著名商品和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被勒令停止生产销售，甚至人民群众的穿着、发式、民族风俗习惯、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被当作“四旧”来扫。不少地区的庙宇、道观被强行关闭或砸烂，神职人员被赶走，僧尼被勒令还俗，经文被焚毁。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全部被毁，有的受到严重损坏，如著名的鸡足山金顶寺铜殿、安宁法华寺石窟、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丽江忠义坊、潞西凤平佛寺与金宝塔、中甸归化寺、保山卧佛寺、腾冲来凤寺等。作为昆明市城徽标志的金马碧鸡坊也被拆除捣毁。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几乎全部被破坏。

破“四旧”又和揪斗所谓“牛鬼蛇神”结合进行。非法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勒索财物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仅昆明市就有1749户被非法抄家，包括被保护而住于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36户也被批斗和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抄走的财物有黄金4800两、银圆2.99万元、珠宝玉器1.36万件、现款9.84万元、有价证券93.73万元、珍贵工艺品和历史文物3613件。破“四旧”的这些行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了严重后果。

【故纸堆】

山东党史记载的济南“破四旧”

按：本篇摘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内部发行）。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66年）8月下旬 红卫兵走出学校开展破“四旧”活动 自22日新华社报道首都红卫兵向传统的文化习俗发起攻击的消息后，全省各地红卫兵迅速走向社会，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攻击。这一行动，逐渐造成极大的声势。“四旧”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人名、地名、街名、老字号商店，到妇女头发、衣着，以及古籍、字画、文物等都在大破之列。到9月初，

破“四旧”之风遍及城乡，在文化领域造成极大破坏。其后，破“四旧”逐步发展为社会的“斗、批、改”，即所谓的“斗、抄、挖、赶”。到10月13日，济南市即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这些行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故纸堆】

四川党史记载的成都、乐山“破四旧”

按：本篇摘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97—298页。渔歌子录入、提供。

（1966年）9月19日 从本月开始，四川省城乡出现红卫兵“破四旧”活动，发生抄家、砸文物古迹等情况。四川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从9月14日到19日的6天，在成都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共抄家440余户，被查抄人员中，有省人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负责人等。10月6日、7日，仅乐山城区开始出现红卫兵大破“四旧”的行动，到次日，被查抄户数即达254户，被查抄物品有3261件，人民币25854元，粮票850斤，公债3507元。到10月11日，乐山城区被红卫兵查抄的东西有：黄金100两，银599.5两，银元1924个，现金62269元，公债6996元。此间，所谓破“四旧”也涉及到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

【故纸堆】

武汉党史记载的“破四旧”

按：本篇摘自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323—324页。渔歌子录入、提供。

（1966年8月）22日，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

8月23日，武汉地区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开始上街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共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的所谓革命行动，决定改换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

时，抄家、游斗的浪潮开始泛滥。仅 23 日一天，长航机关便有 104 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据事后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 21000 家，抄出黄金 1110 斤，白银 1800 斤，银元 267000 余块，现金与存折 440 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 112 起，死亡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的 32 人。

8 月 25 日，正在进行的中共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

【故纸堆】

天津市有关发还查抄物资的几份资料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按：这是天津市 1972 年有关发还 1966 年“破四旧”中被红卫兵查抄的物资的几份资料，其中涉及到的两位被抄者李永章和梁维泰，在当时都是天津电磁线厂职工，被定性为“资本家”。

原件均为钢笔手写件。原文中语句不通处未作改动。

李晓航解读说明：

在我收存的关于“破四旧”的文革资料中，有五份 1972 年天津电磁线厂落实查抄物资发还政策的个人档案，这五份档案分属五个人，每份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即（一）发还情况报告；（二）被抄对象定性及物资处理备案表；（三）发还查抄财物清单；（四）被抄对象对落实返还物资政策的认识。涉及被抄对象身份、查抄时间、查抄单位、被抄原因、查抄财物内容及数量等。

从档案反映的信息看，这五个人均为天津电磁线厂职工，在“破四旧”时分别被天津十中红卫兵、天津财经学校红卫兵和本厂抄家，抄家时间在 1966 年 9 月。他们之所以被抄家，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出身，有的是“资本家”，有的是“地主”，有的是“历史反革命”等。从被抄财物清单上看，既有戒指、耳环等金银首饰，也有毛巾、床单、棉被、大红布、饭桌、衣柜、收音机、缝纫机、座钟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破袜子之类，表明当时查抄者对于哪些物品属于“四旧”，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和界定，查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跌入低潮。1972 年，天津电磁线厂革委会根据天津市革委会 95 号文件精神，落实查抄物资发还政策，将这五个人定性

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遂派人分别与他们谈话，宣传交待政策，对查抄财物进行核对。经天津市南开区查抄办公室批准，该厂于1972年10月至11月将查抄财物发还本人或其子女。为防止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出现意外，该厂举办了落实查抄物资发还政策学习班，让查抄对象表明态度，写出对落实政策的认识，使其“端正思想”。其中一位被查抄对象梁维泰在自己的感想中写道，抄家前他提心吊胆，担心抄家和被斗，抄家后反倒感觉踏实了，因为“被抄的物品是剥削来的，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应当还给人民”。到发还被查抄财物时，他激动地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给了我政治上的生命”（见梁维泰的查抄档案）。这种心态，真实地反映了被查抄者由抄家时的诚惶诚恐到返还财物时感激涕零的心理变化。

查抄物资发还政策的落实，虽然挽回了这些被查抄者的经济损失和部分政治名誉，但官方对当初红卫兵的查抄行为不但未予追究，而且还要求被查抄者要认识到“红卫兵小将革命行动”的“伟大意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实际上等于宣告了查抄行为的合法性，也暴露了“破四旧”前后政策存在内在的矛盾。

关于发还李永章查抄物资工作情况报告

李永章，男，年龄59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资本家。

政治面貌：群众。原抄单位：十中。现住：河北区中山路达仁里4号。

根据天津市95号文件精神，我们对李永章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物资，进行了核对落实工作。72年10月14日找本人谈话，问及被查抄情况，同时讲清有关落实查抄物资政策精神，然后叫本人和子女写出被查抄物资清单。10月20日又找本人进一步讲明党的政策，同时问及子女工作单位。10月21、22日两天分别到子女单位联系挂钩，后和查抄办公室西开一号路库史伯常、李日桓联系，并征得库管人员同意，订于10月24日李永章和子女李益香、李益庭，儿媳常禄田叁人前往西开库，认领核对，大部分实物基本清楚。但儿媳常禄田实物没有，子女李益香、李益惠仍差一小部分物品。核对后，我们又和库管人员老李同志研究说：西开四号路库老乔同志，有十中查抄的混合物，我们又和老乔同志研究，征得老乔同志同意，并通知儿媳常禄田和子女李益香、李益惠，分别在10月27、28号前往西开四号路核对认领。基本核对清楚。

经几次核实，其被抄物资有 西开一号路木箱、衣物、马甲、布料共计：69件，四号路库十中混合物计：30件。其中有木箱、台灯、衣物等物。

在核对清楚的基础上，于 10 月 30 日让其本人李永章参加第二批落实查抄物资政策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天津市革委会 95 号文件等有关党的政策，让其对红卫兵抄家和现在发还有了正确认识。

1972 年 10 月 28 日，经区查抄办公室批准，其上述物资总计 99 件，全部发还本人。

于 72 年 11 月 2 日，本人和子女前往西开一号路库、四号路库，领取实物，经本人和子女签字后全部发还。

1972 年 11 月 2 日

经手人：刘雨春 刘宝忠

（右图：当年填写的“发还查抄财物清单”中一页。）

~~~~~☆~~~~~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对查抄物资退还的认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教育，在疾风暴雨革命行动中，领袖毛主席思想哺育成长的红卫兵小将们走上街头，进行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清除了污泥浊水，形势好得很。是兴无灭资推陈出新纯洁的革命行动。在全国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给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咱厂领导组织了落实毛主席指示发还查抄物资的学习班，听到了书记做了有关文件的传达报告，这次领导组织学习班的重大意义是，对领取物资的人最大的关怀，最终目的是教育每一个人，对此次发还领取物资要有正确的对待，防止每个人出现不良的东西，要端正态度，我本人对此次发还领取物资在思想上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我回家后对我的子女做了学习班实况的确

切的转告，使他们对这次发还领取物资也有了相当的提高，更使我和我的子女深深地感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温暖。对红卫小将的革命行动我们应当看到他们的主流和大方向，对个人的得失更不能斤斤计较，在思想上更有顾全大局，想到革命二字，在工作上要更加一把劲。

今天在工作和学习上处处要以学习班的精神为动力，坚决出色完成组织领导交给的任务，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的洪流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活到老，改造学习到老。

李永章及子女等

72.11.10

~~~~~☆~~~~~

关于梁维太所查抄物品发还报告

按：原件中的“梁维太”均应为“梁维泰”，是报告起草人为省写笔划而自改的同音字。

梁维太，男，现年 52 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资本家。现住天津和平区河北路益安里 21 号。

根据市革委落实查抄物资有关政策精神，我们从 5 月 8 号以来对梁维太所查情况进行核对工作。该梁是廿五中所查抄，我们对梁维太进行了交待党有关落实政策和这次落实发还查抄物资的重要意义，促使其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在讲清政策的基础上由本人填写物品清单。

我们到廿五中了解到当时所查情况又到南开区查抄办公室经过几次的核对所查的物品全部存放在南开区查抄办公室（家具缝纫机衣服等共 126 件）。在落实过程中我们反复找其谈话进一步交待党的政策，使其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革命行动和现在发还是进一步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英明正确，使其感到党的政策无比温暖。

在核实清楚的基础上，在 10 月 16、17 两日我们按照市 9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举办了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95 文件和有关党的政策，学习后由本人谈对这次发还物资的认识和体会。

经学习班后我们与该梁一同去南开区查抄办公室。

到 10 月 18 日全部（家具缝纫机衣服等共）126 件发还本人，并由本人在发还单签字。

本人自交金银变价 12.62（注：原件无单位）于 10 月 17 日领出。

1972 年 10 月 21 日

经办人

~~~~~☆~~~~~

## 梁维泰对发还查抄物资的认识

按：原件无标题，现标题是录入者加上的。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走上街头查抄四旧查抄了大批反动派隐藏很深的枪支弹药反动证件地主的变天账家谱等等以及剥削阶级的大批金银财宝剥削来的物资，给资产阶级的迎头痛击，涨长（注：原文如此）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彼时我也认识到革命的洪流和大好形势，结合到自己的利益是提心吊胆恐怕抄家和被斗，后被学校红卫兵抄四旧将几件木器家具衣物查抄未有批斗，在生活上没有困难反而倒感觉踏实，认识到被抄的物品是剥削来的，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应当归还给人民。这次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退还被查抄物资使我认识到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给我政治上的生命，决不是经济上的物。今后更要对自己子女加强教育认识到剥削可耻剥削有罪使其在各工作岗位上贡献出力量努力学习要求进步早日加入党组织，为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

对自己发还的物资合理安排使用随时作到勤俭节约精神。

梁维泰

72.10.17

---

【故纸堆】

## 文革中重庆市两份更改地名通知

庞国义 录入、提供

说明：1966 年“红八月”开始的“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各地掀起改掉“封资修”街名、地名、单位名的热潮。笔者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石桥铺，就在街上

看见过以“革命群众”名义要求把石桥铺改名为“工农街”的大字报，理由是石桥铺是农村人民公社驻地，农民多、周边工矿企业的工人多，为体现工农联盟，故应称“工农街”；在公社（原“乡政府”）门口又看见过要求将石桥公社改为“红岩公社”的大字报，理由是“红岩村在公社境内”。这两个要求都得到区人委发文认可。笔者就读的重庆市第二中学有学生写大字报要求改校名为“毛泽东主义战校”，有人还擅自用红纸把这几个字贴在原校牌上，结果未得认可。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沙坪坝区卷）》的记载，当时由沙坪坝区人委（即区政府）发过四次更改地名的文件，但笔者只找到一份。此外还应有企业单位（如石桥铺铁作社改为“红星农具厂”，沙坪坝电影院改为“红卫兵电影院”）、公办中学（如石桥铺中学改为“燎原中学”）、民办中小学（如石桥铺民中改为“育新民中”）、社办小学等等的改名文件。目前尚未查到。

1971年林彪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进展，一些文革初期的时髦做法也遭到否定。许多地方曾被改“红”的街名又被改了回去。1972年6月30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顿街道名称，制换街牌、门牌工作的通知》，11月21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使用整顿后的街名的通知》，笔者找到了后一通知，特录出以供参考。

##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室

### 关于转发本区已改街道（地）、单位名称的通知

#### 区办（66）字第45号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以磅礴的革命豪情，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强烈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街道、商店等名称，更改为带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更改意见。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对于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革命群众提出的新的名称，根据统一平衡，避免重复和照顾职工群众、革命师生和地段居民的精神，经区人委召集有关部门讨论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已更改了一些街道（地）和单位的旧的名称，并已通知执行。为了统一称呼，便利工作，现将已改部分整理发给你们，以前通知如有出入，以此为准。

附：更改街道（地）、单位名称一览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盖章）

报：市人委办公厅。

抄：区委办公室和有关单位。

发：各街道办事处（室），农村人民公社。

### 一、主要街道、地名

| 新名    | 原名          |
|-------|-------------|
| 东方红大街 | 小龙坎横街、双巷子   |
| 抗大路   | 沙坪坝南街、正街、北街 |
| 革命路   | 陈家湾至小杨公桥    |
| 革命支一路 | 天陈公路        |
| 烈士墓路  | 小杨公桥至童家桥桥头  |
| 前卫路   | 童家桥至井口石朝门   |
| 红卫村   | 詹家溪         |
| 红旗路   | 小龙坎正街至新桥    |
| 东风路   | 大坪正街至石桥铺车站  |
| 东风支一路 | 石小路         |
| 红武岗   | 林园          |
| 红岩路   | 嘉陵路（华村至小龙坎） |

### 二、比较大的街道、地名

| 新名   | 原名                 |
|------|--------------------|
| 工农村  | 袁家岗、马家堡、剪刀岩        |
| 反封街  | 七牌坊                |
| 八一村  | 浮图关、上肖家湾（以上为原大坪地区） |
| 劳动支路 | 高家花园（原沙坪坝地区）       |
| 前卫桥  | 远祖桥（原双碑地区）         |
| 反封岭  | 宝轮寺、白岩（原磁器口地区）     |
| 红阳街  | 红槽房（原天星桥地区）        |
| 向阳坡  | 金刚坡（原歌乐山）          |

### 三、小街、小巷

#### 原磁器口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朝阳街 | 金碧正街、水井巷、七二巷、金碧后街、石槽门 |



|        |                                     |
|--------|-------------------------------------|
| 工人新村   | 文昌宫                                 |
| 朝阳村    | 筲箕岚垭                                |
| 团结街    | 金蓉正街、金蓉横街、金蓉横巷、上河巷<br>百子巷、猪市坝、上下蔡家湾 |
| 劳动路（併） | 金沙正街、金沙横街、教院路                       |
| 前卫路（併） | 大土坪                                 |
| 光明山    | 马鞍山、高石坎                             |
| 团结街（併） | 老米市                                 |
| 上游村    | 黄桷坪正街、后街、中街、横街、吴家院、汪家堡              |
| 东风一村   | 凤凰村、凤凰山、正义坡、大碑                      |
| 东风二村   | 信义村                                 |
| 东风三村   | 凤咀                                  |

#### 原沙坪坝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劳动路（併） | 柑园村      |
| 文新村    | 汤家花园、老菜市 |
| 团结一巷   | 饶家巷      |
| 团结二巷   | 汲水巷      |
| 团结三巷   | 金容巷      |
| 团结四巷   | 郎家巷      |
| 团结五巷   | 温家巷      |

#### 原大坪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劳动坡 | 下肖家湾、天灯堡       |
| 战旗村 | 谢家花园、新市场       |
| 红军村 | 彭家花园           |
| 向阳村 | 单巷子、九坑子        |
| 红光村 | 长航村（长江路 899 号） |

#### 原石桥铺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工农街 | 石桥铺（街） |

|       |     |
|-------|-----|
| 东风支一路 | 白马幽 |
| 新建村   | 孙家岩 |

#### 原詹家溪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卫国山  | 挂榜山              |
| 红卫村  | 詹家溪街             |
| 红卫一村 | 下堆金村、枝元村         |
| 红卫二村 | 上堆金村             |
| 红卫三村 | 老大石村             |
| 红卫四村 | 新大石村、勤居村、六洞村、孙基村 |
| 红卫五村 | 松江村、自由村          |
| 红卫六村 | 江家院、农药村          |
| 红卫七村 | 桂家桥              |

#### 原化龙桥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红岩一村 | 楼子沟、交农村  |
| 红岩二村 | 黄桷树、化新村  |
| 红岩三村 | 化后街、和平新村 |
| 红岩四村 | 庞家岩      |
| 红岩五村 | 化上街、化山村  |

#### 原石井坡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前卫支一路  | 老双碑   |
| 团结坝（併） | 会山顶   |
| 向前村    | 砖瓦窑   |
| 反修村    | 和平前后山 |
| 前卫村    | 窍门山   |
| 红缨山    | 青草破   |
| 红缨村    | 大河沟   |
| 四新村    | 老双碑   |

### 原童家桥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反帝一村 | 五灵观 |
| 反帝二村 | 刘家坟 |
| 反帝三村 | 谢家山 |
| 反帝山  | 杨家山 |

### 原土湾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红星岭   | 二层岩          |
| 红星一村  | 羊角堡          |
| 红星二村  | 糖房弯          |
| 红星三村  | 学堂弯          |
| 勤建村   | 民主一、二村       |
| 节约村   | 大鑫路、花园、步月村   |
| 劳动村   | 丰村、渝鑫路       |
| 革命村   | 槽房弯          |
| 红光路   | 大公路          |
| 光明街   | 龙泉巷          |
| 战斗一村  | 大公村          |
| 战斗二村  | 民主院、京华院      |
| 东方红支路 | 汉渝路          |
| 东方红四村 | 农场弯 1——214 号 |
| 东方红五村 | 榕酸里          |
| 东方红六村 | 榕酸新村         |

### 原渝碚路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工建村   | 工建村、河西 |
| 革命支二路 | 灯泡厂宿舍  |
| 革命路一村 | 陈家湾    |
| 革命路二村 | 向乐村    |
| 革命路三村 | 雨友村    |
| 革命路四村 | 百合岭    |

|       |                |
|-------|----------------|
| 东方红一村 | 塑料新村、市一中宿舍、六六巷 |
| 东方红二村 | 江边村、石门村、栾家院    |
| 东方红三村 | 水塔村、四方井、门诊村    |

#### 原小龙坎街道办事处辖区

| 新名  | 原名      |
|-----|---------|
| 跃进坡 | 观音庙、后山坡 |
| 跃进村 | 康宁路、黄桷湾 |
| 光明坡 | 马道子     |

#### 其他

| 新名       | 原名                        |
|----------|---------------------------|
| 红岩岭街     | 歌乐山正街                     |
| 红卫街      | 山洞正街、新建二、三路<br>(包括西山新村附号) |
| 红旗支二路(併) | 复元寺(原天星桥地区)               |
| 红卫支一路    | 新生路、平正农场(原山洞地区)           |
| 红卫支二路    | 福华路(原山洞地区)                |
| 红武村      | 菜市场(原山洞地区)                |
| 红武山      | 游龙山、新菜市场(原山洞地区)           |

#### 四、街道办事处(室), 农村人民公社(乡人委)

| 新名       | 原名       |
|----------|----------|
| 东方红街道办事处 | 小龙坎街道办事处 |
| 抗大路街道办事处 | 沙坪坝街道办事处 |
| 磁器口街道办事处 | 磁器口街道办事处 |
| 烈士墓街道办事处 | 童家桥街道办事处 |
| 前卫路街道办事处 | 石井坡街道办事处 |
| 红卫村街道办事处 | 詹家溪街道办事处 |
| 红旗路街道办事处 | 天星桥街道办事处 |
| 新 桥街道办事处 | 新 桥街道办事处 |
| 工农街街道办事处 | 石桥铺街道办事处 |
|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 大 坪街道办事处 |
| 红岩路街道办事处 | 化龙桥街道办事处 |
| 工人村街道办事处 | 土 湾街道办事处 |

革命路街道办事处      渝碚路街道办事处

|        |        |
|--------|--------|
| 红岩岭民政室 | 歌乐山民政室 |
| 红卫街民政室 | 山洞民政室  |
| 红星街民政室 | 井口民政室  |

|           |           |
|-----------|-----------|
| 红旗人民公社    | 红旗人民公社    |
| 红旗乡人民委员会  | 覃家岗乡人民委员会 |
| 红星人民公社    | 井口人民公社    |
| 红星乡人民委员会  | 井口乡人民委员会  |
| 红岩岭人民公社   | 歌乐人民公社    |
| 红岩岭乡人民委员会 | 歌乐山乡人民委员会 |
| 红岩人民公社    | 石桥人民公社    |
| 红岩乡人民委员会  | 石桥乡人民委员会  |

## 五、区属公办小学

| 新名    | 原名    |
|-------|-------|
| 红岩岭小学 | 歌乐山小学 |
| 大寨小学  | 金刚坡小学 |
| 井冈山小学 | 山洞小学  |
| 东风一校  | 大坪小学  |
| 东风二校  | 歇台子小学 |
| 东风三校  | 石桥铺小学 |
| 勤俭小学  | 白鹤林小学 |
| 燎原小学  | 六店子小学 |
| 向前小学  | 斑竹林小学 |
| 红岩一校  | 化龙桥小学 |
| 红岩二校  | 华村小学  |
| 红岩三校  | 黄桷堡小学 |
| 雷锋小学  | 树人小学  |
| 红旗一校  | 小龙坎小学 |
| 红旗二校  | 文化村小学 |
| 红旗三校  | 覃家岗小学 |
| 星火小学  | 凤鸣山小学 |
| 工农小学  | 上桥小学  |

|       |       |
|-------|-------|
| 七一小学  | 新桥小学  |
| 延安小学  | 高滩岩小学 |
| 抗大路小学 | 沙坪坝小学 |
| 劳动一校  | 劳动路小学 |
| 劳动二校  | 金沙街小学 |
| 东方红小学 | 莲光小学  |
| 红卫小学  | 磁器口小学 |
| 长征小学  | 井口小学  |
| 志龙小学  | 二塘小学  |
| 南泥湾小学 | 黄泥乡小学 |
| 红岩四校  | 土湾小学  |
| 红阳小学  | 石堰村小学 |

~~~~☆~~~~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通知）

渝发【1972】57号

关于使用整顿后的街名的通知

为了适应革命和生产的需要，有利于城市建设，经区、街革委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酝酿讨论，对我市八区街道名称进行了整顿。全市二千一百零二条街道，有一千二百八十六条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名称，新命名一百五十三条，合并了三百八十八条。现将整顿后的主要街道名称通知于后，请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启用整顿后的街名。希各单位向群众公布。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主要街名对照表。

附件：

主要街名对照表

市中区

| 现名 | 原名 |
|-------|----------------|
| 八一路 | 原保安路 |
| 五一路 | 原民国路 |
| 邹容路 | 原反帝路 |
| 新华路 | 原新华路 |
| 民族路 | 原红卫路 |
| 民生路 | 原幸福路 |
| 民权路 | 原反修路 |
| 中华路 | 原中华路 |
| 临江路 | 原援越路 |
| 青年路 | 原青年路 |
| 中山一路 | 原红旗路 |
| 中山二路 | 原红旗路 |
| 中山三路 | 原红星路 |
| 中山四路 | 原向阳路 |
| 和平路 | 原大寨路 |
| 人民路 | 原人民路 |
| 长江一路 | 原长江路两路口至红岭路口一段 |
| 陕西路 | 原红港路 |
| 解放东路 | 原解放东路 |
| 解放西路 | 原解放西路 |
| 上南区路 | 原兰考路 |
| 下南区路 | 原兰考路 |
| 上清寺正街 | 原嘉陵路 |
| 李子坝正街 | 原嘉陵路 |

沙坪坝区

| 现名 | 原名 |
|-------|----------------|
| 长江二路 | 原长江路红岭路口至袁家岗转盘 |
| 石杨路 | 原石桥铺至杨家坪 |
| 石小路 | 原石小路 |
| 渝碕路 | 原红旗路 |
| 大坪正街 | 原东风路 |
| 歇台子正街 | 原东风支一路 |
| 新桥正街 | 原新桥正街 |

| | |
|-------|--------|
| 化龙桥正街 | 原嘉陵路 |
| 小龙坎新街 | 原小龙坎横街 |
| 小龙坎正街 | 原红旗路 |
| 沙坪坝正街 | 原抗大路 |
| 沙坪坝北街 | 原抗大路 |
| 沙坪坝南街 | 原抗大路 |
| 天星桥正街 | 原红旗路 |
| 双碑街 | 原双碑街 |

江北区

| 现名 | 原名 |
|------|------------|
| 建新东路 | 江北转盘至五里店 |
| 建新南路 | 江北转盘至嘉陵江大桥 |
| 建新西路 | 江北转盘至猫儿石 |
| 建新北路 | 江北转盘至松树桥 |
| 石门街 | 原石门街 |
| 大石坝街 | 原大石坝 |
| 华新街 | 原华新街 |
| 江北正街 | 原江北正街 |

南岸区

| 现名 | 原名 |
|-------|---------|
| 烟雨路 | 原烟雨路 |
| 崇文路 | 原崇文路 |
| 海棠新街 | 丁家嘴至前驱路 |
| 上新街 | 原大庆街 |
| 弹子石新街 | 原骆子堡 |
| 东坪正街 | 原大佛正街 |

九龙坡区

| 现名 | 原名 |
|-------|----------|
| 西郊路 | 原杨渡路 |
| 南泉路 | 原南泉路 |
| 西郊支路 | 原杨家坪至动物园 |
| 李家沱正街 | 原朝阳街 |

| | |
|-------|------|
| 马王坪正街 | 原抗美路 |
| 杨家坪正街 | 原新建街 |
| 黄桷坪正街 | 原五一街 |
| 谢家湾正街 | 原建设街 |
| 南泉正街 | 原战旗路 |
| 石坪桥正街 | 原红卫路 |

大渡口区

| 现名 | 原名 |
|-----|------|
| 钢花路 | 原先锋路 |
| 马王街 | 原工农街 |

北碚区

| 现名 | 原名 |
|-----|-------------|
| 中山路 | 原革命路 |
| 解放路 | 原解放路 |
| 朝阳路 | 原新华路 |
| 人民路 | 原人民路 |
| 天生路 | 原反修路 |
| 南京路 | 原革命路 |
| 胜利街 | 现汽车站至区革命委员会 |

南桐区

| 现名 | 原名 |
|-----|------|
| 矿山路 | 原万青路 |
| 万新路 | 原反帝路 |
| 万盛路 | 原胜利路 |
| 桃子街 | 原跃进街 |

发：各县级单位和县属区，各公安派出所、街革委。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印发
(共印 950 份)

上海“破四旧”亲历

唐勇康

1966年的炎炎8月，“红太阳”灼热下，文革温度陡然上升，“横扫一切”进入新阶段——红色恐怖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学生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口里狂呼“造反有理”，一身黄军装，手臂一律箍着“红卫兵”红袖章。

上海红卫兵“破四旧”，首当其冲是“三包一尖（包头、包脚、包屁股，尖头皮鞋）”的衣着打扮，那几天，马路上走过一个头发被剪乱，裤脚被撕开，赤膊涂墨汁，拎着没有鞋尖的鞋的人，毫不稀奇，那是一些理了个小背头、裤脚管裹脚踝、穿花衬衫、尖头皮鞋的“上海老克勒”（对追求海派时尚生活中年以上市民称呼，明显有别于工农兵阶层）上街，猝不及防被逮着，当街被红卫兵修理的结果。我也带几个同伙，在四川路、溧阳路那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疑青年，围住他拿出剪刀准备下手，急得他赶忙拿出“南京大学”的学生证说自己也是个造反红卫兵，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才把他涂过发蜡的头发捋捋乱放过算了。

接着是改路名、弄堂名，我们学校附近的山阴路改为山鹰路（受当时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山鹰之歌》影响），吉祥路成反修路，兴业坊变红旗坊，极富

诗意的甜爱路因在鲁迅故居和墓边，而被改成杀气毕现的“横眉路”，等等。



（左图：《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合刊登载的新华社照片。文字说明是：原上海永安公司的职工，在红卫兵革命造

反精神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四十八年的“永安公司”这块旧社会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命名的臭招牌，更换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店名。）

搞笑的是四平路改成工农兵路，它有条支路，顺理就改成“工农兵支路”，可往水泥路标杆上用柏油写路名的红卫兵被揪着打了一顿，因为上海人读“支路”与“猪猡”完全是一个音，污蔑工农兵还了得？

山阴路吉祥路口有一家上海那时并不多见的室内小书摊，占地7、8个平方，当时，上海马路上的小书摊并不少（两条长矮凳，一副可折叠的书架，马路街沿靠

墙打开就可以），但像吉祥路口这样规模的小书摊却不多。首先，它建在屋檐内，装有电灯，刮风下雨，天色暗下来照样可以借阅。书架是固定的，三面墙排成一圈，上下六、七格密密麻麻挤满了小人书——连环画，“库容量”绝对充足，我们想要看的书都可以看到。书老板印象中瘦瘦的，年纪并不大，戴着副眼镜，常年穿一件中式对襟衫。在“破四旧”之前，往往下午3点多钟放了学，先不急回家（那时的家庭作业实在不多），约几个小伙伴，一路飞奔到吉祥路，首选目标当然是路口的小书摊。就是这个小书摊，使我早早地接触了古代“四大名著”（那时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另添一个《封神榜》），从《岳传》、《杨家将》中获取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了解了《牛虻》、《林海雪原》等数不清的中外小说的故事梗概和精髓。啊，我要在这里向那早已不知去向的瘦老板鞠躬：你的小书摊曾丰富了多少稚童的精神生活，让课堂里学的字词在这里得到实践巩固，也燃起了不计其数的少年文学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拍摄的《今天我休息》电影，里面有一场胖子关宏达为“马天民”收集菜叶去喂猪的戏，就是在吉祥路拍的，镜头里居然出现了这个小书摊人头攒动的盛况！

不幸的是，“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的一个炎热下午，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还残忍地一起参与了！——我们一大帮中小学生，戴着红袖章，喧嚣着卷过已改过名的“山鹰路”（山阴路），来到“反修路”（吉祥路）口，这里燃起了一个熊熊的火堆，我们有的围着火堆，大呼小叫着“造反有理”，有的到书摊，到小铺，捧来一叠叠的连环画和其它曾经是我们游戏用具的木刀、木枪、假面具、香烟牌子之类东西，毫不留情地往火里扔，火越烧越旺，火光浓烟中，我看到小书摊的瘦老板也在起劲地将自己摊头的书、小板凳、木书架往火堆里扔，扔一次，跟着大家举起手臂喊几句口号！

山阴路上文化读书人多，这天如“火烧连营”，火堆一个接一个，浓烟滚滚，烧掉了多少书籍画册，多少人类文明结晶品，不计其数啊！

南京路更是人山人海，群情亢奋！外滩“万国建筑”外墙面上爬满人，重磅榔头下，廊柱屋檐上的西洋浮雕统统遭殃。四川路桥脚下邮政大楼顶一组雕像就从那时起消失了近30年！街道上商店的旧店招全部敲光，百年老店里供着的瓷器、木像拿出来砸烂，“朵云轩”里的图画、字幅，“王开照相馆”里的旧照片，都被搬出来一火焚之，“蔡同德”药房一把高2米的铁算盘，被店员献出来示众后一斧头，红木算盘珠子满地滚……

虹口公园里有座1929年造的英式沙滤饮水器，它有个漂亮的半圆雕纹穹顶（我们每次来玩，必享受这免费饮料，一按按钮，一股清泉直飙喉咙），此也面临厄运，被昔日的受惠者们团团包围，所幸它钢筋水泥加花岗岩的身胚实在撬不动，红卫兵只好敲掉水龙头，在水盘上留下些许痕迹就收了兵——全国唯一的盘

座成为文物保存下来了，但从此再也没有流出过一滴水。这些都是我当年亲眼所见，如果查查当年《解放日报》、《文汇报》，可能都有图文记载。

玉佛、静安、龙华三大古寺，是红卫兵“破四旧”的重点战场，听说玉佛寺因为有一批“鲁智深”舍命抗争，菩萨受损较小，另外两寺的庙堂可就遭了殃。建于三国孙权时的静安寺地在市中心，每逢香期佛诞，全寺开放，香客游人，一时称盛。这时寺庙遭受严重冲击，佛像被毁，法器文物等劫掠一空，僧众被逐，整座寺宇被改为工厂。1978年我考进师范大学，和同学就近去市区边沿的千年龙华古寺游览，几进殿堂重檐巍峨，佛房里可以用得上“荡然无存”这个词！南市人民路大境路有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关帝庙，因“飞楼压城坳，雉堞屹环堵。下临竹千竿，风来势飞舞”的“胜境烟霞”，被誉为沪滨八景之一，辛亥革命后拆城墙都保存下来了，这次逃不过了。庙被彻底捣毁，后来成了里弄生产加工组车间（直到1995年修复）。关老爷头是檀香木雕的，再次身首分离，被丢到人民路上点火烧，老城厢里顿时香气弥漫，几天缭绕不散。我们听说后，晚上特地跑去闻过，回来路经城隍庙，看到“校场路”路牌还竖着，几个人用力去来回摇晃，竟把水泥路牌放倒了。

只因红色代表革命，十字路口的交通灯“红止绿行”竟被改成“红行绿止”！那时，上海交警是坐在路边岗亭里闭启红绿灯指挥来往行人车辆的，《红行绿止通令》贴到岗亭的玻璃窗上，一些交警不得不按此开关红绿灯。即使有些交警坚持“红止绿行”，车辆行人却“红行绿止”穿马路了。可想而知，路上交通一片混乱到什么地步！好在那时车辆稀少，轧死人的大事故倒也未亲见过。这样乱哄哄的街景持续有个把星期，实在不行了，周恩来出面向红卫兵发了话，公安部发文重申“红止绿行”规矩，才让这出从北京推向全国的荒诞剧落幕。

“破四旧”中不可思议的恶形怪状，不胜枚举。现在说给70后的人听，没有几个会相信。但在那时却是再平常不过。我妈妈有个“小姊妹”，1949年前是个纺织女工，红卫兵杀进弄堂造反时，吓得她赶快把家里积攒的一点金链条、金戒指、金耳环等黄货，统统丢进抽水马桶。“罪证”是冲掉了，一辈子却在懊悔中挣扎，临死都在喃喃：“我哪能会价戇？会价戇？”

红卫兵“破四旧”很快就发展到上门抄家，无法无天的局势下，人性之恶如出闸洪水。抄家开始还限于本单位“黑五类”家庭，上门前还要到对象所在派出所去报到通气。没多久，就扩散成所有“运动对象”，也不要通知任何人了。换言之，只要你是一帮红卫兵，想抄谁就可以去抄谁，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怎么抄就怎么抄。基本程序还是有的：抄家对象门上先贴大字报，然后勒令对象站在凳子上被批斗，让周围邻居识

其真面目；翻箱倒柜，将其家中凡是“封资修”的罪证打包装箱，被抄物资列一清单，对象签字认可后，装上黄鱼车运到“抄家物资接收处”（虹口区一开始是送往公安分局，后来是送到四川北路上的红星剧场），他们造册开具收条。实话实说，文革初期大多数人的道德底线还是在的，偷盗的不能说没有，但不多。我参与抄的几家，后来发还抄家物资，我陪着他们凭收据清单都领回了自家东西，没有纠纷发生。这让我总算问心无愧。但要放到现在……可以想象！

根据当年歪歪扭扭写的日记和记忆，我直接参与抄家的情况是：

第一次是晚上跟高中学生去黄渡路上物理老师黄崇武家，想抄出“火焰喷射器”罪证（因有人说他是国军兵团司令黄维的堂弟，也在国军里做过少校，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火焰喷射器就是他出的主意，烧死成千上万解放军），当然没有，结果把黄老师夫妇押在弄堂里批斗了一阵（陪斗的还有寄住其家的黄维读高中的女儿）。还一起去过四平路吴伯和、宝安路谢其仁、四达路邓梦萍老师家，主要是批斗他们；

住在山阴路东照里的同学徐朔明，成为我自己带队去抄的第一家。抄走了他资本家父亲的十几本外国集邮簿和一些西装领带之类；

住在川公路的同学张杰也出身资产阶级，去抄走了不少画轴和瓷器；

女同学金抗美的父亲是“右派”老师，我们去时，她父亲学校的红卫兵已经来抄过了，一片狼藉，地板也被撬开了。我们不甘白跑一趟，看他手表不是国产的，就硬叫他脱下收走了；

同学胡仁杰也是个学雷锋积极分子，要求上进，乒乓球打得好，市里比赛得过奖。小学里就与我很要好，住得近，经常去他家做功课，胡母对我和气，不嫌烦。他主动找到我说他父亲“镇压反革命”时捉进去死掉了，要求去抄他家。我们去了，看到他在自家墙壁上贴了许多揭发他母亲的大字报。胡母腿脚有点瘸，叫她站在矮凳上在邻居面前示众。在胡仁杰引导下，逼她交出了藏在相框背面的胡父照片，烧掉了。

我想起了小学里曾来代过语文课的彭冠凯老师，小学临毕业时，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他辅导我们写了篇《记一次劳动》，想不到那年（1964年）小升初的作文应试题恰恰是《记一次公益劳动》。我记住了他对我的帮助，也记住了他住在祥德路一幢独立带花园的洋房内。“破四旧”时9月初的一天，我对班里红卫兵同学说了彭老师情况，再到居委会一打听，说彭家是广东籍搞棉纺的资本家，晚上就直奔那里，墙上贴好大字报，敲开门，就闯了进去。里面实际住了彭系好几家人家，彭老师的伯父彭顺是公私合营已经将企业交出去的老板。我们在彭家抄出东西有衣物书籍画报，还有

玳瑁、蝴蝶标本，贵重的有银洋、小金条、银行存折。正好彭老板厂里工人开着卡车也来造反，我们就用卡车装上东西送到虹口分局后撤退了。彭家有私人电话的，后来小洋楼客厅被高中红卫兵强占，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反司令部。

一天，我们听说欧阳路上一只垃圾箱里发现一把丢弃的美式冲锋枪，很好奇，就到现场去看。枪没有看到，被住在附近的几个居民拉住，要我们去看她们写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揭露本里弄一个姓虞的“地主婆”，怎样怎样不老实，想要变天杀共产党劳动人民。我们义愤填膺，当即去把虞姓“地主婆”揪到马路上批斗，异想天开逼她交代“冲锋枪是你丢的”。批斗会没有结果，最后自说自话写了一张“逮捕证”，贴上照片，扭送她到公安局，却被接待警察臭骂一顿，说：“你只小赤佬敢开逮捕证，胆子不小，犯法的！”被留下来讲讲清爽。事后想想，她们只是邻里纠纷，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利用撺掇红卫兵就可以把对方斗得死去活来。

满眼荒唐事，一掬辛酸泪！……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真实写照，而我本人的经历，仅仅是这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中的沧海一粟啊！

【生逢乱世】

爱在风雨夕

王坚勇

1966年春节过后，我由大连老家返回齐齐哈尔上班。我是1965年由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任技术员的。同寝室的房师傅见到我，就说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这是他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客气地对他说，自己刚工作，想待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找到我问：“最近是不是又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我很吃惊，他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是呀，但我还是那句话，待几年再考虑。”“嗨，早晚的事，可别错过良机呀，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就拉倒，省得我老为她牵挂。”

就这样，他硬性给安排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正好他妹妹乘早班的火车回郊区的学校上班，我们就在车站的候车厅见了面。

至此我就算处女朋友了，她在郊区上班，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有次她将我给她看的一本在学校写的“诗集”，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还给我时，我被那娟秀的字迹所感动，愈品味便愈迷恋她那种透过字迹散发出来的

贤淑和青春芬芳。没想到这“见字如见人”真是这样准呀。

不久，她就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为此她曾多次委婉地向我提出，要我慎重考虑。可能是在这方面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并不在意，并打趣地说：“若我俩是发小长大，可能今天你都不会理我，因我小时候特淘，而且专与老师作对，所以一直到六年级才批我加入少先队，那时的你早已是两道杠的中队长了。”接着又讲了一些我小时候的顽劣故事给她听，听后她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那张圆润的脸更显得灿烂，特别是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皓齿真让人喜欢。

我们相好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行动开始了。伴随着那到处震响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大规模的阶级清洗铺开了，当时我很为她的处境担心，一再叮嘱她处处要谨慎小心。

她告诉我，由于自己的“政治贱民”出身，从1957年14岁时就懂得了世态炎凉，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

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周六晚我到车站去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就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段小故事：我俩认识不久，一次在街上遛马路时，突然窜出这条小黄狗，见到她就向身上扑去，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但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将它抱起说：“这是我家的小狗，叫‘黄黄’可厉害呢。”“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一对老妇人身边……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对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原来她俩在偷偷验收我呢。再后来我到她家时，这条小狗见到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走到我跟前，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进入9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你分手……今后我们作为好朋友相处吧。见到信我很吃惊，无怪乎最近在一起的日子，她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什么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我还逗她，我与你一起去看，帮你参考参考，莫非又有高枝可攀……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想起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后，方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原来是她的父亲已接到单位文革小组的勒令：“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这件事在十几天前，她就看到了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已有所预感，

为了不影响我，才痛苦地下了与我分手的决心。

第二天我请了“代休假”前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从小巷里赶出一群被红卫兵打骂、押解遣送的“黑五类”。这时你会顿感“红色恐怖”确实已从传单上走进了现实。

一进大院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瘦高个交涉着：“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又上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全带走。”这时我女友从屋里跑出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只见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在这“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最高指示到处传的时期，作为一个“坏人”你只有躲的份。我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就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王，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份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

在搬家过程中，那条“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吠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为此曾被那位姓郭的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自“红八月”的恐怖行动开始，这个一百多户的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虽然已故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连长，但自己出身是城市贫民，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强迫剃了“阴阳头”批斗一通，当晚就上吊自尽了。三天过后，两个孩子照样全被遣送，她那最大的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在老人下跪请求下，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女友的父母是最后一家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她的父母被驱赶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就赶上这个运动，课不上了，红卫兵又不让参加，只好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的“黄黄”瞎了一只眼，就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她弟弟讲，在他十岁那年的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才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过来及时发现叫人抢

救，要不，全家都没命了。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带有体温的软软舌头，舔着我的脸颊，好像说：“你真好，没有离开我们。”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指出：“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说完就把材料扔给我们。

她的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女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大锁并扬言要办“街道托儿所”。当时“黄黄”有病打蔫了，就被刘大娘暂时留下。

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此时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敌我分清。”在那些日子里，她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掀起一股以出身定一切的飓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

那时对她唯一的安抚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而见到我后她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我比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自这年的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国各大、中、小学就掀起了大串联运动，起初像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到后来就没人管了，特别是我在北京公出时，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资料，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对于没有任何反动言行的、只是他们的出身问题，包括他们的子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

见到这份文件精神后，她就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去，记得那天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后窗直接进入站台，亲自帮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入车内。

到北京后，她们直奔清华园，因为那里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真的找到了这份文件的铅印材料，即刻在学校买了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装好寄给乡下的父母，她母亲接到信后，连夜骑着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就将这封信，交到她丈夫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立马找

到那位姓郭的组长，他一见这黄色牛皮信封，并带有红色底字的“清华大学”字样的信函，顿时肃穆起来，因为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中，人们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傻眼了，在其他成员的一致同意下，他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但农村那头则没这么顺利，那里的文革头头就是不同意，最后她的父亲将新买下的房子给了那人才放行。

真没想到周总理这几句话，对她们家的命运重于九鼎。

那天是 1966 年 12 月 3 日，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事们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右图：作者夫妇在这一风波平息之后的结婚照。）

但“黄黄”没有等到这一天，据刘大娘讲，自女友的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好起来，每天就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那坏了的一只眼流出的血水，不断地淌着……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历史上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而当年肆虐在中华大地的“血统论”与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统优秀”的谬论有何区别？父权帝制利用阶级理论搞集权政治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我国从 1949 年以后直到 80 年代初，被极左路线划定的“政治贱民制度”，则是又一创新，这些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的人群，从来就是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批人的数量，若按毛泽东打击 5% 的专政对象这一比例来推算，其总人数为 3000 至 4000 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远比这个数字大好几倍。更何况每一次新的政治运动又会增加新的一批“5%”……这一歧视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盛行了三十多年，且愈演愈烈，其危害性只能用“祸国殃民”四个字来概括。

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2009. 11. 22

【生逢乱世】

回忆被抄家时的意外一幕

孙丹年

文革初期“破四旧”，许多“黑五类”的家都被抄了。而轮到抄我家时，已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家被排到抄家顺序的后面，主要原因是我的继父是贫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都是贫农）。因此我家的绝大部分财产是贫农的财产，在当时不但不应被抄，还应该得到保护。而我的母亲是右派分子的遗孀，本人也是右派分子，虽然改嫁到贫农家里，但她的财产自然应该列入被抄之列。

如何界定家庭财产的阶级属性？对抄家者来说难度很大。然而漏掉这么一个引人瞩目的右派分子家庭，他们又不甘心。

再说，自从我的生父去世，住房被没收，一家人流离失所，我们搬来搬去，越搬越差，最后来到继父家时，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财产了。在农村的封闭环境中，谁家有什么好东西，邻居都清楚，“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何况当时穷得连饭也吃不饱，家徒四壁者比比皆是，我家也一样。

但是人们都知道我家有一堆书。母亲将原有的丰富藏书千淘万汰之后，也还留下一二百本，藏在一个半人高的五屉柜里。

继父不识字，没有哪怕仅仅一页的书籍纸张，这批藏书只能是母亲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抄家的人们决定，抄我家时只抄书。

这天，一群抄家的人来了。他们分别是我家所在的红光生产队的社员和金刚碑街道上的人，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他们见到继父在家，略显不自然，表情僵硬，动作呆板，语气倒还客气。

领头的问：“你们家的书在哪儿？”继父指指五屉柜。他们看柜门上挂着锁，就让交出钥匙。我妹妹回答：“没有钥匙。钥匙在妈妈身上，妈妈去学校上班了。”领头的就说：“没有钥匙就算了。”他们打算离开。

我从藏钥匙的地方取出钥匙，交给一个我认识的中年人，他平常对我们家不错，跟继父关系好，对我和妹妹说话比较和气，有什么事也挺照顾的。我的动作是无意识的，无非“既然你们要开柜子，就给你们钥匙吧”。后来家里有人责备我不该交出钥匙。母亲说：“他们来抄了也好，要是他们今天没抄到书，就还会再来，再要发生什么事情就难以预料了。”

这帮人刚打开柜子，就发生了意外：一直站在旁边看着的继父，突然用一种充满愤恨的动作，抢先抱出放在最上层靠外面的一摞书，重重地摔在地上，说：“都拿去烧了！免得光看书不做事！”他指的是我和妹妹经常看书耽误干活。

但是这一摞书主要是马列著作，因此当场就有好些人惊呼道：“这不能摔！这不能摔！这是马列主义！”

继父顿时惊慌失措，后退一步，吓得呆住了。他很明白，如果他是“黑五类”，

这个举动可以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其他人也都怔住了，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其中好些比继父强不了多少，自知对书籍的“政治属性”不能进行判断。他们的自信遭到了打击，原本的汹汹气势也遭到了遏制。

这样一来，凡是他们看不懂、不能断定作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书，就没有拿走。比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系列教育学著作、五十年代出版的《儿童文学》系列丛书，等等，都得以幸存。而两厚本精装《石头记》、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书籍无一幸免，全都在当晚投入了火堆。

幸存下来的这批书籍，成了我和妹妹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的精神粮食，也成为我俩后来考上大学的“基础教材”。

到 2011 年，我把最后留存下来的父母的藏书一共 87 本（年代从 1944 年到 1959 年，其中不少都具有版本价值），全部捐赠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

而继父突然摔书的动作，我后来回想，觉得他的愤怒很可能是假装的。

继父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民，幼年从岳池县讨饭来到重庆郊区农村。文革前，他跟很多文盲一样，对文化知识怀抱着敬畏，对知识分子也十分尊敬。尽管看书确实耽误干活，但他很少干涉我和妹妹看书。

之后，文革深入发展，他感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不但要求他跟我母亲划清界限，还面临被“贫下中农协会”除名的屈辱。有一天他在家里大声咒骂，假装追打我母亲，举着竹棍使劲敲击地面，碰见什么打什么，竹棍破了“哗哗”地响，让左邻右舍都听见。他认为这样就能让人们相信他“划清界限”了。

1974 年底，继父被查出患了胃癌，于 1975 年 3 月去世，享年大约 52 岁。

2015,1,9.

【昨日心迹】

贵州老高日记（摘录）

高致贤

按：本篇原载天涯社区>天涯论坛>“煮酒论史”[近代风云]，原题为“一个文革办公室秘书的心路历程”，发表日期：2011-6-16 11:07:00

1966.8.29. 星期一 阴雨

在县委主持下，今天下午 4 点钟，全县（机关单位和城关附近农民）五千多人在县体育场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检阅了今天刚成立的红卫兵。

……县长张清濂同志在会上讲话，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

1966.9.1. 星期四 晴

上午召开近万人大会，斗争了前中共大方县委财办主任赵明英，会上有 33 个牛鬼蛇神被戴尖尖帽。会后有 19 人被红卫兵牵着游街示众……

追记：县委 8 月 30 日研究决定由政府机关干部在县政府小会议室内对赵进行批评。31 日地监委书记杨培臣从省开会回毕路过大方，听大方县委汇报后，指示要放到群众中去批判斗争，遂将会议改在城南小学操场进行，并决定将大方一中的曾昭瑞、罗安谦、李荣贵和邱元森 4 人陪斗。县委立即召开各机单位负责人次日带全体人员参加。会议改为红卫兵代表陈亮芬主持。

会议开始不久，完全失去控制，一些单位的红卫兵自行将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本单位人员揪到主席台前弯腰低头陪斗。所谓的“红色恐怖”从此开始（详见我回忆录中的“‘九.一’事件”）。随后几天，随时都有红卫兵到处抓人戴尖尖帽游街。

1966.9.4. 星期天 晴

今天到贵阳参观外地红卫兵串连活动的红卫兵回来了，他们在电影院开会介绍了参观情况和感想。总的说来，就是那里的红卫兵真正做到“敢”字当头，敢于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作无情斗争。……他们一致要求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1966.9.6. 星期二 阴雨

斗争进入复杂化阶段，……今天，我们组织各单位的全体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小组以及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在二中球场和礼堂学习十六条、林彪同志、周总理在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反复讨论，反复对照。从学习中看出同志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一中的部分学生看问题片面，有的只凭个人意志，不顾全局……

追记：当天收到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我们立即组织上述人员学习、对照、讨论，指出我县一些武斗例子，我为此专门写了一期《简报》，可惜后来被造反派作为“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证收走了！

1966.9.7. 星期三 晴

今天县委机关正式成立“红卫兵”，我也参加了。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真理……

1966.9.10. 星期六 晴

今天地委电话会议通知：各地革命师生代表要分期分批到北京参观北京各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1966.9.11. 星期天 晴

今天在一中操场召开近万人的斗争大会，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昭瑞、资产阶级教育“权威”罗安谦……

追记：这是一次针对9月1日开始的乱揪乱斗，低头弯腰、喷气式、揪头发等武斗形式搞的文斗样板：让被斗争对象坐在台子两旁的椅子上，静听台子中央斗争人的发言。理由是落实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改触及被斗对象的皮肉为触及灵魂。

1966.9.12. 星期一 晴

根据上级指示，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暂停，要全力以赴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怎样搞好善后工作，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事。……

追记：从9月1日至10日这段时间的运动主要是破“四旧”、扫“牛鬼蛇神”。城关地区由各街道积极分子配合学校红卫兵深入居民家搜查旧书画和罗汉、观音及绘有才子佳人和典故花鸟等旧瓷器。街道集中后由公安人员押解“四类分子”送交县文革办公室。一共收了一间屋子的旧书，一间屋子的古董瓷器。每间屋子约五六十平方米。堆放好些层。

善后工作就是：我将文革办的所有文件和总计10期简报正式装订归档案。抽文化馆的陈少珍将书清理归类分放。弄完后，我便于9月19日到达溪区雨沙公社搞“三秋”生产——秋收、秋耕、秋种去了。

1966.11.9. 星期三 阴

按县委通知，我今天乘铁路招工队的车回县。城里一片……

我的任务是接待各地革命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师生。我县的一批接一批地外出串联；外地的一批又一批地经过我县。内地外地学生川流不息。他们总的目

的是为了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追记：我回县时，我县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已由李遇春主任带上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接见了。我下乡时整理好的旧书、旧瓷器也不见了。后问得知，已由新庄公社武装民兵营长苗锁银押着“四类分子”背到县体委球场去公开销毁了。按文革前期要求，除了《性知识》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两本书可就地销毁外，其余旧书留待文革后期分级处理。可不知他们根据什么精神销毁的。

【书海泛舟】

在北京“破四旧”的恐怖日子里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选读)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按：本篇节选自《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一书第八章，现标题是另拟的。该书于200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另有（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参议会议长、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201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孤舟独树：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

康国雄，1929年生。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1978年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其幼年时与蒋介石的一段“忘年交”及因此引出的一系列坎坷人生故事，近年已有不少报刊和香港凤凰卫视、阳光卫视等媒体报道。康国雄先生已于2015年1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好得很”

文化大革命初期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既然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次运动的对象，那么，像我父亲那样在国民党时期拥有个人资产的“资本家”，自然就属于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了，当然也就逃脱不了这场腥风血雨的运动的打击。父亲在晚年，又一次饱尝了政治运动的打击，而且是“史无

前例”的暴行迫害。

1966年8月下旬，在所谓“大破四旧”的口号下，红卫兵冲向了社会，大肆抄家、打人、抓人……

我总觉得这不是中央的精神。人民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政权怎么能让它随便地乱呢？我总相信中央会出来制止。

但是，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

“好得很！”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我看了之后，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央的精神。他们怎么会鼓励群众起来乱呢？

一些基层政府组织和地方公安局派出所领会了中央精神，他们有意抛出机密的人事档案材料，挑唆群众斗群众。得到伟大领袖赞赏和支持的红卫兵，根据基层政府组织和公安派出所提供的名单，像篦子似地挨家挨户、肆无忌惮地抄家、打人。各机关、厂矿、大专院校中揪出来的“黑五类分子”的亲属，上自父母下至儿女以及七姑八姨均遭株连，波及的深度与广度是史无前例的。打死人的流血暴行等等都出现了。

当权者中利用此类行动报个人私仇的大有人在。文革后被正式公开揭露出的最高层领导人物，就有毛泽东的夫人，臭名昭著的江青，和林彪（当时全国的副统帅）的老婆，劣迹斑斑的叶群等人。江青为了掩饰30年代她在上海滩的丑闻，支使叶群派出部队人员假冒红卫兵，到那些了解她底细的文艺界人士家中抄所谓“黑材料”——就是有关她个人历史的资料及照片。

一时间，查抄之风，波及全国，一发不可收拾。有些单位也有从阴沟里钻出来的三三两两组织起来所谓红卫兵，无需任何证件或手续，可以随时到他们选定的家庭去“造反”。这种无法无天的暴戾行为，受毒害最深的还是当时的青少年。他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不惜到各个老前辈家中去砸、去打人，去捞钱财。可是他们的最后前途也逃不掉劳改般的上山下乡的命运。据当时揭发出来的情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过后，清扫天安门广场时，竟捡到“革命小将”失落在广场的金条及金银首饰。这成为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在善良的人们中广为流传。

当时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昼夜24小时都能听见打人的鞭挞声，凄惨的哭叫声，首都已变成了恐怖世界，人人自危。

我真不明白，这些怎么能叫“好得很”呢？

半夜转移财产遇险

我被揪斗后，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孩子们受歧视和欺侮，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得不把3个孩子送到居住在城内的父母家。

由于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由妻代劳，每天去父母家照看一下全家老小。

一天晚上，妻子回来，惊恐万分地向我讲述她在街上亲眼看见到处都在抄家、游斗、打人和打死人的血淋淋的事实。她勉强回到家后，双腿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感到形势发生了剧变。一方面安排妻子躺下休息，另一方面我心乱如麻，焦虑万分，在斗室里来回走着，思考今后的生活。

我想，建国初期是消灭地主和富农，这次运动是不是要消灭资本家呢？父母年老体衰，儿女们年幼无助，难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呢？

我很清楚，我并不是“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罪名”最终不能成立，当然定不了罪。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干儿子”，当时，我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可能干什么与政治有关的事，又能怎么样？甚至我还天真地想，我是一个国家干部，国家宪法还在，不会有人抄我的家。

我相信自己还年青，能够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处理复杂问题。我想，首先应把父母的钱财保护好，才能保证他们今后能生活下去。怎么保护呢？把钱转移到我家，也许比放在父母家更安全？

目标明确后，就得迅速行动。

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只有我与妻子二人之中的一个，当时，她是可以自由行动的。我呢，被剃了一个“阴阳头”（就是一半有头发，一半剃光，以此来侮辱人格），难以出门见人。

只好请妻子去办了。

我把意思向她说明，请她当晚再返城去父母家一趟，把钱财全部转移到我家，由我们来保管。

妻子一听，就说：“不成。”她一想起在街上看到的打死人的情景，就迈不开步子。

我看她惊魂未定的样子，就劝慰她休息一会儿再去。

30分钟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我催促妻子起床：

“泽琴，赶快起来吧，已经11点多了。”

她勉强从床上起来，站在那里迈不开步。她说：“不行，我的两条腿直哆嗦，走不了。”

我十分理解她，疼爱她。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在名牌大学受的高等教育。

从未见过光天化日之下能用鞭撻的办法把一个人活生生打死，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居然发生在我们“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大街上，怎不叫人胆战心惊？

但我又出不去，左邻右舍会认出我。

怎么办，怎么办？

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的困兽，在斗室里兜了几十个来回，想不出别的办法。

但是，我心中认准一条，问题一定要解决，事情非办不可！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古训：“人遇万难须放胆。”

我去！我亲自去一趟。

我的决定让妻子大吃一惊：“你这副模样如何去得？太危险。”

我想，这关系到全家老小今后的生存，是件大事。不管会出现多大的危险，我也要冒这个风险了。

我对妻说：“这样吧，替我找一套平时不怎么穿的衣裤和帽子。”

我乔装打扮一番。让妻子把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先推到楼群后面，在无人处等我。

我乘人不备，溜出家门，骑上自行车直奔城里。

到父母家已是午夜时分，可庆幸的是，我的敲门声并没有把家中的保姆惊醒，是母亲来开的门，父亲还未上床睡觉。我的出现，使他们万分惊喜。

我把自己的想法简略地说了一遍。父亲还半信半疑地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他说，三叔家已去过。三叔还介绍了红卫兵第一次到他家“扫四旧”的情况，只是砸了一些东西，什么都没拿。当时，一切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共产党流血牺牲，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会被他自己任意破坏掉。

我说，外面风声很紧，社会秩序大乱，许多地方都在抄家，随意抢夺私人财物等。我们不得不有所防备。

父亲最终接受了我的想法，嘱咐母亲把现金、存款、公债券清理出来，悉数交我拿走。

母亲是当家过日子的主妇，又给我添加了一些崭新的床单和衣物等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总共包了两大包，挂在我自行车的前面。

在匆忙之中，她没有把两只钻石戒指（一颗5克拉，另一颗3克拉），还有一张存香港汇丰银行的存单（大约5万港币）交我。

我把父母的钱财及两个大包袱放在车前，一个照相放大机（是我刚买的），放在车后架上，骑着超载的自行车回家时，已是深夜了。

到了朝阳区水碓子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从西往东的窄小马路，一边是个

有水的小湖，另一边是一排平房，小马路上停着一辆卡车，挡住我的去路难以通行。我只好下车等待卡车开走。

当我再次迈腿蹬车时，突然听见一阵恶狠狠的喊叫：

“停车检查！”

我一看，马路两旁钻出十几个手执大棒的年青人，站在我面前。

我心头一惊，但不动声色地迅速跳下自行车。他们厉声向我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干什么的？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是机械学院的——机械学院就在前头嘛，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就住在水碓子居民区，几单元几号，我都说了。我镇静自如，对答如流，竟然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随后，听见他们几个人小声商量：“让他走吧。”

我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放开了，我赶快骑上车离开了他们，回到家中。

到家坐定后，我开始感到后怕——如果他们检查我车上的两个大包裹怎么办？打开包裹，发现问题，必被打死无疑了，如果他们不打死我，把我押到机院，也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是转移“剥削阶级”财产的“反革命行为”，属“罪大恶极”的性质。

苍天在上，我总算在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又一个险滩！

父亲遭到三次抄家

当然，当时抄家的厄运是逃脱不了的。

不过，我们谁也没想到，第一批到我父母家去骚扰的红卫兵，竟是康家的一个亲戚后代，我一个叔父的外孙女带去的！

这位十几岁的姑娘，当年是中学生。按当时的“血统论”划分，她应该属于“黑五类”，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因为她的父亲也有“政治历史问题”，但是长期接受“革命教育”长大的她，太渴望自己也成为“革命接班人”了，为了表白自己要革命的决心和“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决与自己的资本家外公等人“划清界线”，她带着同学，先到她的亲外公家去砸“四旧”，然后到我父亲家。

她带着一伙中学生，胸怀着杀气腾腾的“革命气概”，去到我父母家，他们一伙人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砸东西，辱骂老人。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本是正值花季，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旦被煽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革命情绪”后，所表现出的可笑、可悲、可恨，是难以形容的！世界上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恐怕只有当年纳粹德国的青年法西斯分子抄犹太人的家了。不过这批中学生以后的坎坷命运，并没有比什么资本家强多少。

事后，我父亲表现得十分大度和宽容，很少向家人提及此事，只是向我谈到触动他心灵，而永远磨灭不掉的两件事。

一是这个姑娘，在那批学生当中，跳得最高，喊得最响，表现最为恶劣。她用手杖的弯曲柄勾住我父亲的脖子，从里屋拉到外屋。

我的十多岁的儿子记得，由于她这种野蛮行径的鼓动，另一位学生就用鞭子抽打爷爷，只听见爷爷疼痛得直叫嚷……

我们是一个礼仪之家，父辈均受过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尊老爱幼、谦虚谨慎是父亲对我们从小的家训。康家的后代，表现出这等行为。当然令父亲备感痛心。

第二件事，是这位外孙女，当着他的面，把他珍藏数十年的一张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珍贵照片撕成碎片！

父亲说，每撕一下，就像在撕他的心，撕一下，他的心痛一下。从来就很孝顺的父亲，怎能接受这种羞辱祖宗的卑劣行径呢？

第一次红卫兵骚扰几天之后，机院的红卫兵又到父母家门口去贴上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我家“父亲是大资本家，儿子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云云，还恶毒地贴上对联，上联是“康氏父子一对混蛋”，下联是“康氏父子罪有应得”，横批是“罪恶之家”。

他们在我父母居住的环境中张贴羞辱两位老人的大字报还觉不够，还公开要求街道居委会组织群众去抄他们的家，批斗他们。

第二批抄家行动就是街道居委会组织的。

这批暴徒一进门就点名破口大骂，要父母交出“反动”材料。他们连续去骚扰了一个多星期，每次都让老人面壁而站，暴徒们猖狂地翻箱倒柜。把我父母家中所有的箱子，抽屉，每个角落都翻了个够。他们满心以为从我父母那里抄出多少金银财宝，结果是大失所望。最后，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满满地装了几大箱运走了。

街道的红卫兵去抄我父母家时，母亲还有钻戒两颗和香港汇丰银行港币存单一张放在贴身衣服口袋里，在红卫兵反复抄家的情况下，母亲吓得直哆嗦，虽然东西很小，但因为是夏季，衣服穿得太少，很难藏匿。

我妻子去看他们时，红卫兵还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搬东西。母亲乘人不备，把钻戒递给我妻子，示意她拿走。

妻也是吓破了胆，怕红卫兵搜她的身，又把东西递还给母亲。

她们二人来回递了两次，最终还是没有拿走。

红卫兵经常不断去骚扰，母亲实在承受不了保留这两颗钻戒和港币存单的精神压力。当晚，就把两颗颇值钱的钻戒扔在马桶里用水冲走，存单用火烧掉了。

母亲事后说，把这些东西销毁后，心头一下就轻松了，总算扔掉了沉重的“包袱”！

以后，街道居委会又勒令我父母从小院的北屋搬到西屋。

过去北京的房屋都按正南正北方向盖建，正北房子采光避风是最佳方向，所以民间俗语是“有钱不住东南房”，命令他们搬到西屋，亦是一种惩罚性的作法。

几天后，8月27日，我父母又被第三次抄家。

这批去抄家的是机院校办工厂的“革命工人”，负责监管机院劳改队的人。他们有的人也是怀着借此发一笔横财的卑鄙目的，穷凶极恶地翻了一通，凶狠地审问我父母：“钱都哪里去了？”得不到满意答复，他们就认为父母把钱财埋在地下了，便在堆煤的后院掘地三尺。这批贪婪的暴徒当然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抄到什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就逼我父母家的保姆“揭发”，要她“站稳阶级立场”，保姆被吓昏了头，就揭发我母亲曾烧毁过一些本子，他们又借此大发雷霆，硬说我父母是销毁了“变天账”，把我父母狠狠批斗了一番。

最后，这批暴徒把我父母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一扫而光全部抄走，除了我父母每人身上穿着的衣裤没有抢走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套。

他们拉走了几大卡车的东西，留下了四面秃壁的房间与无辜的老人和孩子们！

以后，有人说，机院某某在抄康家后，发了一笔横财。机院领导要我就此写出书面情况。

所谓“销毁变天账”，不过是父亲为了怕被抄家抄走惹出麻烦而叫母亲烧掉了他多年的日记本。

父亲本质上是个文化人。他们那一代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所写的日记，都是说真话的记录，不是后来流行的那种专写豪言壮语给别人看的东西。

父亲晚年写过一篇短文《父亲的手泽》，其中就谈到，辛亥革命后，1913年，他从成都举家搬迁上海时，清查家中存物，曾发现有一木箱祖父留下的手稿，是祖父在成都当发审局委员时到各县查案、办理案件的手稿。父亲一时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就全部毁掉了。后来他才懂得了，祖父那些办理案件的手稿，对于考察社会风俗、法律得失，是很重要的原始材料。把它们销毁了，对社会是损失，对祖父是不肖。为此，父亲失悔了几十年。

由此可知，当时他叫母亲烧掉他那些日记本时，心中是多么矛盾、痛苦！不是万不得已，哪里会走到这一步……

父母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从此，街道居委会在派出所的指使下，对我父母的态度变本加厉。

他们强令我父母及孩子们搬到对面的一间破平房居住，并准备把二老遣送回四川老家，送到农村。当时大批无辜的所谓“成份不好”的“黑五类”分子。从北京强行遣送回各地农村，其中有些在路上便受尽折磨而死去。

我父母心里明白，即使回重庆也活不出来的。二老准备了绳索，打算在逼他们离开北京时，就双双上吊自缢。

后因没有联系上遣送的地方，遣返的行动只能作罢。

据我儿子回忆，他们老少五人搬到破房后，爷爷抱着他们哭泣。

那段时间，我爱人进城去看娃儿，钱都在我手头，就每天都买了东西去看他们，我们买了鸡蛋，煮熟了带去，把蛋壳都是剥了的——蛋壳不能带去，怕让邻居看到我家倒出的垃圾中有鸡蛋壳，不得了啊！买些肉送去，也都是没有带骨头的，怕让别人看到垃圾中有肉骨头……

他们搬到破房住了约 10 天，我父亲的老友何北衡先生知道了，冒着个人被揪斗的危险，去找街道居委会主任说理。连唬带诈地警告那位主任说，“你们知道康老是什么人吗？他是高级民主人士，重庆市政协委员。建国前，对共产党有很大帮助。是有贡献的人，周总理都知道他。你们这样对待他是要犯错误的！”

没想到这一席话居然奏效了。

这位居委会主任文化不高，强令我父母搬出自己住房是无任何依据的，何北衡先生的话让他摸不清底细，又不敢真的冒犯了也许是个“重要大人物”，便又糊里糊涂地让我父母等从破房子搬回院子里的西屋。

在当时的极左恐怖气氛下，基层干部懂不懂政策没有多大关系，在行动上越左越好，对准这些所谓本人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做都不算过头，包括打死人，决不会有人过问的，我对这位主任一直怀有那么一点“谢意”，就是对他糊里糊涂地让我父母又搬回自己房子这一举动。虽然我父亲对他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行动十分反感。

我父亲自己花钱买的这个有 14 间房屋的独院里，已经趁火打劫地搬进了几家说不清来路的，所谓“成份好”的住户，他们借着“革命”之机，不花一分钱就强占了“资本家”的房子，俨然是“革命行动”。院子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大杂院，从此再无安宁日子了。

父母和孩子们搬回自己家院里，起初仍住在西屋，严冬逐渐逼进，何北衡老人又一次说服了居委会主任，让我父母等搬回北屋。

我又从机院造反派那里好歹取回两床被子，老少五人勉强使用两床被子御

寒。

北京的冬季是寒冷的，尤其对于从属温带气候的四川来的老年父母来说，度过严寒是不容易的，他们自己买房后，购置了一个烧煤块的大炉子，在冬季取暖。每天添煤，铲灰都是比较重的体力活，因而雇了一个保姆帮助我母亲。自从“运动”开始后，父母被迫辞退了保姆，一切繁重的体力活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跛着一条腿，父亲患有肺心病，哮喘等严重疾病。这样长此以往，总不是一个办法。

1967年，我辗转托人，用父母仅剩的5间平房，换到朝阳区东光路19楼两间半烧煤气、供暖气的单元房，住了下来。这套单元要每月交房租费。

从此，我父母完全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抄家以后，父亲的水肿都已经发展到全身了。没有办法，送到协和医院，说他心衰，要吃强心药。还说他那个居住环境有问题，对他身体很不利。住到单元房以后，虽然居住和活动面积缩小了许多，却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冬季，室内温度可保持在20度以上，对二老的健康大有裨益。同时也免去了院子里强行搬进去的几户人对他们生活的监视、骚扰。可以生活得稍微自由一些。

父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日益加剧。每天白天也要在床上躺几个小时。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天，只要精神稍好，就起床写回忆或悼念亲人的文章。他说：“我所知道的有关康家的大事，在死之前，都应该写出来。”

从1967年搬到楼房，直到1969年11月去世，总共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外界“红色恐怖”风声鹤唳，自己生活困顿病魔缠身，每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坚持坐着的情况下，他陆续写下的文章有：

《家乘》（我们康氏家族的家谱、家史）；

《忆心孚兄》、《哭心之弟》、《悼念杨清华（原配妻子）》等有关亲属的纪念文章；

《章氏丛书》（章太炎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父亲最崇敬的人，此文介绍了我父亲当年在上海出资出版章老文集的情况及文集目录，并附有章太炎所作的序）；

《我与报》（父亲从商前曾办过报纸、杂志，当过访员、总编，此文回忆了这段历史及清末民初的一些报刊情况）；

《对联》（介绍有关对联的一些趣话和联语）；

《父亲的手泽》（回忆我祖父当年办理公文的手稿及其对认识社会风俗、法律得失的作用）……

这些文章，不论是悼念亲人，或是介绍他早年与报刊界接触的事例，以及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父亲

回忆大伯父那篇，后来我们找人拿到台湾去，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们是非常重视的。还专门加了编者按。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社会科学院，要写民国史，需要康心孚的资料，拿了介绍信到我这里来找，看了我父亲写的《忆心孚兄》以后就说，你的父亲真是了不起，在那样的一个动乱的时候，手边没有任何资料，还能写出这么多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把这些都写出来，留给后人，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写自己，他说，哪有自己写自己的道理！

要是我当时处境好一点，也许还可以支持他写出更多的回忆，留存下更多的珍贵史料。可是，我当时已是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几十个人没有抄出我的秘密

我在机院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抬不起头，但是我当时居住在机院以外的居民区，邻居都是不同单位的人，各忙各的，大多不知道我在单位的处境，我居住的环境中还存留着一丝温暖和人情味。

这是机院“文革领导小组”不能容忍的。他们要让我完全斯文扫地，想把我涂抹成一个人人唾弃的小丑、恶魔，“批倒批臭”，似乎非如此才能解气。

1966年8月24日，就在这一天，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到我家门口来贴大字报，煽风点火，说我父亲是大资本家，我是蒋氏干儿子，要街道居民委会组织红卫兵批斗我，抄我的家。

这张大字报猛击了我一棒，我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

原来他们还会来抄我的家！

我本来以为他们只会抄资本家的家，我的想法是那么幼稚可笑。危机要降临我家了，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幸好是夏天，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12点回来，要到2点才又开始劳动。大字报在我家门口贴出的当天中午，我就利用回家吃饭的时机，迅速把从父母家转移出来的一部分钱财，塞进两把椅子坐垫下的弹簧里，那两把带弹簧的椅子是我妹妹婆家的东西，看起来都烂朽朽的了，我就把包弹簧的布揭开，弹簧不是中间有空隙吗，我把钱都分别塞到那些弹簧洞里头。你就是拿起椅子，那椅子看起来都烂得很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有那么多的钱在里头。另一部分包成小包的贵重东西，塞入厕所蹲坑旁的一个未封口的废管子口内，外面用一个脸盆盖上，再压上一个孩子用的澡盆。从外表看不出破绽，不过是两个天天使用的盆子放在墙角靠着而已。

一切安置妥当之后，我心里仍然十分气恼，当日下午，我就去找“监改组”

的人说理。你们找不到证据定我的罪，为什么还到处贴大字报散布我是“干儿子”的谣言？如果是事实，你们干脆送我去公安局好了！

我坐在那里执拗地不肯离开，非要他们给一个说法。他们很是气恼，可又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这样闹腾，当然把这批“革命派”气坏了。当天傍晚，他们把我押回家，对我施行报复。在我居住的楼门前，给我开了一次残酷的武斗会。

他们在我脖子上挂上两块砖头，把一个木凳翻倒，放在卖菜的架子上，让我跪在木凳下沿的横木上。一边的横木跪断了，又把凳子转过来，让我跪在另一边横木上。就这样野蛮粗暴地让我跪着，批斗了我一个多小时，逼我承认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第二天，果不出我所料，“监改组”派来 30 名雄赳赳的“革命群众”，把我押回家。他们把我押在房门外，面对墙壁站着，大约有 10 多人进入我那唯一的一间斗室内抄家，其余在外面看守，把我那温馨的小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触及到。折腾了约一个多小时。

抄家中，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十分担心他们把我藏匿的钱财找出来，很想进屋去瞧一眼。

我借口想喝水，有人递给我一杯水，是用盛洗相药水的杯子装的。我说，这是装药水的杯子，有毒，不能盛水喝。此人不耐烦地说，那你自己进去倒！

这正合我想进屋去看一下的心意。进屋一瞧，满地的衣物，所有的家什都翻了个儿，可偏巧那两把椅子还在原地，厕所内的两个盆子也没有动，这时，我心中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等这批人走后，我愤恨地想道：“他妈的，他们 30 多人并没有斗过我一个！”

这以后，父母知道我的家也被抄了，形势甚为险恶。父亲很焦急，要我妻子转告我，“钱是身外之物，命更要紧，不要为了钱财，把命丢了。如果钱保不住，就烧毁算了。只要把命保住，将来什么都好办。”

我们夫妻二人不敢在房内讲话，因我家房间在楼房底层，窗口正对着马路，怕隔墙有耳，只有躲到厕所内小声商量。妻子泣不成声地转达了父亲的话，苦苦哀求我，把钱和公债券烧了吧，以求保住生命。

但是我不同意。

后来，她又提出，把公债券烧掉，以后不可能兑现了，留下也无用。我知道，爹爹是为了爱护我。

我犹豫许久，终不能下决心，我想，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把钱财转移出来，如果现在把公债券烧毁，以后会后悔的。不行，不能烧掉。

当年，我最大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老三才4岁；我被“劳改”后，“监改队”只给我生活费18元，妻子工资62元。原由重庆市政协发给父亲的生活费90多元，也已停发了。这场浩劫开始后，父亲寄回重庆政协报销的医药费单据也被退了回来，在信封上写着如下的混账话：“造你妈的反，滚你妈的蛋！”按规定，父亲原可报销的医药费就这样被无理地取消了。父亲年老体衰，每月治病服药的开销是很大的。老小七口人，将来靠什么活下去？我看不到光明的前途。

为了全家的将来，我必须保住这些钱！

父亲的遗嘱吓我一跳

我们夫妻二人反复商量到深夜。这时我才想起，应把从父母那边拿回来、塞进厕所墙根废管子口内的几个小包打开仔细看一下，还有什么重要东西。

打开翻看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父亲的遗嘱，吓了我一跳！

遗嘱上赫然写着他死后钱财的分配名单。把我们当时参加工作的兄妹的名字，每人接受钱财的数额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

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如果让红卫兵拿到这张名单，还不挨着一个一个抓出来整死？按当时的理来说，因为我们都有工作，好歹算国家干部，怎能接受剥削来的家产？谁也无法说清。

遗嘱中更令人担心的是，父亲提到居住在台湾的二姐康宁。“如果台湾解放了，康宁经调查没有反动行为，可给她四千元。”由我母亲来执行。

这段话，不过反映父亲思念多年不见的女儿之深情，很普通正常之事。可在当时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年月，这段话若被红卫兵抓住，就可以丧命！

台湾是“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地方”，凡是在台湾有亲属的人，一概不得出国（离开大陆）。因为“左派”们担心，这些人离开大陆就会“叛逃去台湾”，比“叛逃”到任何西方国家似乎更为严重。凡是个人档案中，填写过在台湾有亲属的人，都属于“内控”使用人员。任何风吹草动的事情发生，他都会成为首要怀疑对象。

例如，1968年，正值文革高潮阶段，在外交部门口的邮筒内发现了一封所谓“反革命”信件，据各单位领导向群众介绍是一封匿名的信。在外交部系统工作的人要交待某天某时自己在干什么，每人都要核对左、右手笔迹。其中在台湾有亲属者是重点怀疑对象，半夜会有人上家里来搞突然袭击，查找有关资料。弄得人心惶惶。追查了半年，以不了了之作罢。

我的大儿子宏通在文革结束后正上中学，他申请加入共青团未被批准。该校共青团负责人找我谈话说，宏通有一个姑妈在台湾，为什么有关履历表内不填

写？这真叫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我本人与这位姐姐已几十年无联系，她是1947年因丈夫去台湾工作而全家定居在那里的（并非1949年才逃去的）。我的儿子十一年后才出世，从未与这位姑妈谋过面，如何能牵扯上什么关系呢？但是，正因为有这个在台湾的姑妈关系，我儿子就入不了团。

我妹妹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在大学时代就把这个社会关系填表在案了，从此出国审查，总不能批准，原因就是有一个姐姐在台湾！

这种关系不填表交待不行，从我们普通人来说，认为对“组织”应该“忠诚、老实”，实际上从以后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位高权重的当权者中，有“海外关系”的大有人在，直到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或是在哪次运动中成了挨整的对象，才把他的历史翻个底朝天。而老实交待的普通人却会背一辈子的沉重包袱。甚至影响到下一代，这种事例在我们一代人中真是数不胜数。因为我们纯真、善良，相信了“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宣传，勤奋奉献自己，即便是受怀疑，政治上受歧视，还自责“世界观没有改造好”。80年代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些遭遇和思想感情是无法理解的。

为此，我们当时在同事之间互相绝口不提亲属关系，更不能暴露有亲属在台湾，除了要批判时才提及。

在我父亲遗嘱中这样明确地提到台湾关系，我们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

我着实为父亲的做法着急了，又庆幸把东西转移出来并且没有被抄家的看到。

我想出对付灾祸的计划

当晚我做了三个决定，先把遗嘱烧毁；其次，把总价值十几万元的一批大额存单（一万元一张）送回父母处，请他们自己上缴给街道居民委员会。因为，我认为个人这时候无法取出这样大额的现金；最后，我们设法把公债券和部分现款先找地方藏匿起来。

我与妻说定，万一出了问题，这笔钱被发现，妻可推说不知道，父母也可以说，是我偷走的，好在儿子偷父母的钱，也是会发生的。我认为，只有采取这种牺牲我一人的做法，才能保住全家的生命。

我让妻子转告父母，如果我藏匿的钱物被发现，他们都要咬死了说不知道，由我一口咬定是我偷的。

为了落实最后一条决定，我花了不小的功夫。

我们找出一只破皮箱，把钱和公债券分成若干叠，平整地塞进破皮箱的夹层

中，然后用浆糊把破口粘贴好，箱里装满了旧衣服。从外表看，不过是一只装衣服的旧箱子，看不出任何破绽。也许可以暂时保存一个时期。

另外，父亲还保留了一批美丰银行的纪念金币，十周年的，十五周年的，二十周年的等等，这可是硬梆梆的东西，纯金的，藏在什么地方才能放心呢？

最后，我选择了洗衣服的肥皂。先把肥皂中心挖空，放进金币后，又用肥皂填好抹平，像平时一样，放在窗台上晾干。这样把金币藏进了好几块肥皂中。

我自以为得计，认为这种安排万无一失了。可偏偏凑巧发生了一起有惊无险的“事故”。

一天，妻妹从上海来京休假，去公共澡堂洗澡，当时上海澡堂洗澡需自带肥皂。所以她就从窗台上顺手抄起一块肥皂走了。

洗完澡，回家还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她说，洗澡时，她用完了肥皂，放在边上，一回头肥皂不见了，找了一会才发现另一个人正在用，她说这是自己带来的，那人才把肥皂还给了她。妻妹当时在上海工作，不了解北京习惯，北京的公共澡堂是免费提供肥皂的，所以，她自己带了一块去。而那位使用她肥皂的人，以为是澡堂公用的，不经意地拿起就用。幸好，我这位小姨子舍不得失去这块用票证购买的肥皂。因为，我们当时刚从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日子过得很艰辛，什么东西也不肯任意丢掉。

我听完此话，吓了一跳。如果从肥皂里发现了金币，上面明明白白地刻着纪念美丰银行多少周年的字样，还刻有康心如的名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红卫兵任意上纲上线，又是死罪一条……

我把父亲的钱财处理妥当后，又提出另一项计划：我要妻去法院申请离婚。

妻当然不肯，她说怎能在家庭这么困难的时刻离婚呢？我解释说，他们不会批准的，先登个记，做一个姿态，以表示与我“划清界限”。然后，再去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也表个态：一旦有房子后，即刻搬出与我分居。届时，她带着3个孩子，拎走这只破箱子就够了。离开我之后，也许大家还能活下去。

按当时政治运动的规律，夫妻二人有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全家都会受株连，孩子会失学，受歧视，成人会失业，为了不让全家受连累，只好出此下策。

妻子含泪按了我的计划，做好一切准备。她去朝阳区法院要求离婚。区法院说运动期间不受理，运动后期解决。她又去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备了案。

按照我的计划。父母亲自把十几张一万元的大额存款单主动上缴给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开了一张收据。后由于红卫兵多次骚扰；无法保存，收据也烧毁了。

没想到这个举措，却达到把这笔巨额存单保留下来的目的。否则，收据被那

些多次去父母家骚扰的红卫兵拿走的话，存单也就会全部损失殆尽了。因为当时所谓的“红卫兵”，只要开个介绍信，就可以随意把属于别人的任何数额的存款取走，挥霍掉，不要什么手续，事后也不用交待，无法无天的事例，就是这样每天在发生。

说来可笑也可悲，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所写的按语中，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叫：“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本来是毛泽东形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后来这句话却从反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就经常注意要“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不过，我并不是为了干坏事，并不是为了“反革命”，而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被形势逼出来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许多作为都可以说是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不然，我可能早就活不出来了。

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时，我们通过千难万险保留下来的14万元存款，终于退还我母亲了（此前因母亲生病，通过上级特批先发还了两个5000元）。

遗憾的是，那时，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年了。呜呼，悲哉！痛哉！

【书海泛舟】

乡村里的“破四旧”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选读）

王荣方

按：本篇摘自王荣方著长篇回忆录《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4章，原题为“破四旧”。作者当时是江苏省江阴县申港乡村小学的学生。文中所写到的以农村基干民兵为主体组建的“红卫兵造反派”，应该是当时农村基层的官办群众组织。

在我们学校红卫兵深入写老师大字报、开始“文斗”老师的同时，破“四旧”也随之开始了。

何谓破“四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那么，什么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决定》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界定。但这恰给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留下了想象和创造性的破坏空间。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从砸桌椅、砸窗玻璃开始的。红卫兵们有的手拿铁榔头，有的手拿木榔头，有的手操没有脚的长凳板，有序地，一个一个教室砸过去。课桌椅、窗玻璃砸完了，再砸教师的办公室、办公椅。接下来，红卫兵就是焚书：学生的课本，老师的教本、参考书、备课本、图书，学校里的图书，只要是书，统统堆放在操场上，点燃火，将其付之一炬。

不仅学校在破“四旧”，社会上也在破“四旧”，而且范围比学校更广，力度比学校更大。每个生产大队，成立了以青年基干民兵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造反派先是砸坏庙宇的屋脊，砸烂庙宇里的菩萨塑像，驱赶和尚尼姑，逼其还俗，接着是抄家：先抄贫农、下中农的家，后抄上中农、中农的家，再抄地主、富农的家。

一天晚饭后，天比较热，母亲就把大门关紧，叫我们3个大孩子不要出门去乘风凉，说要开个家庭会，有重要的事情要给我们说。我，哥，姐，感到很有趣，长这么大，家里从未开过什么家庭会，也不知道家庭会怎么开，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开家庭会。因为如此，我们都正襟危坐地坐在凳子上，屏住呼吸，在摇曳如豆的灯光的映照下，注视着母亲的脸。

“下面，由你们爹先给你们说说。”母亲主持家庭会议时说。

爹很享受地猛吸了几口旱烟，然后将烟嘴里的烟灰磕掉，左手拿着长烟杆，清了下嗓子说：“今天下午，大队造反派开了个社员大会，主要说了破‘四旧’的事。什么是‘四旧’？造反派说了，只要是祖宗留传下来的老东西，都是‘四旧’。造反派说了，贫下中农的自查，把自查出来的‘四旧’交给造反派就没事了。但不交‘四旧’的，一旦被造反派抄出来了，除没收‘四旧’外，还要被斗批。我跟你们娘商量了，我们家的‘四旧’有：两只盆底画有龙的盆子，一对插蜡烛的铜制大烛台和一对锡制小烛台，还有我和你娘晒的大床的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我们家里的这些‘四旧’怎么破？你们说说。”

“爹，以前家里的事，都是你和娘说了算。”哥说，“家里怎么破‘四旧’，我们听爹娘的。”我和姐附和哥，说：“哥说得对。我们听爹娘的。”

“不是什么都听爹娘的。”主持会议的母亲说，“破‘四旧’，不是一般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革命的事，是天大的事。所以，我们全家要意见统一，对外一个说法。”

“所以，我跟你们娘商量好了：两只盆子和一对锡制的小烛台交给大队造反派；大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我想办法用凿子凿掉；一对铜制大烛台藏起来。”

父亲说。

“藏起来？”哥惊悚地问，“爹，你不怕被造反派斗批吗？”

“没事。”爹说，“咱们家穷，‘四旧’很少。再说，那对铜制大烛台有四五十斤重，可以浇铸两只铜脚炉（冬天取暖用的器具），过几年芳娣（我姐）出嫁时，可以派上用场（姐出嫁时，作为嫁妆之一的铜脚炉，就是用那对铜烛台浇铸的）。 ”

“要是，要是被人检举揭发了，那，那……”姐因害怕而哆嗦着说。

“割头碗大的疤，怕什么？”母亲说，“再说，没人知道我家有一对铜制大烛台。只要我们嘴巴紧，没事的。老三（指我，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你机灵，你想办法把那对铜制大烛台藏好。”

因父母交办的艰巨任务在身，那天晚上，或因激动，或因害怕，我怎么也睡不着。我设想着几种可能性，但每一种可能性都使我小腹胀痛，老想着要尿尿，怕得我周身颤抖，脚有点抽筋，手心里出汗不止。我想不干，但转念一想，我不能违背父母的旨意。我展开想象，想象着用什么妙法把那对铜制大烛台隐秘地藏起来。我终于想到了办法和藏匿大烛台的地方。

我悄悄地爬起来，点燃煤油灯，端着走出房间，把那对铜制大烛台，放进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再用细麻绳扣系好。我轻轻地拨开门栓，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乘着子夜时分的黑暗和宁静，快跑到村东的东沟头河边，走下码头（我们村后村的人家都在这河的码头上淘米、洗菜、洗衣服），跳入河中，在水中摸了好长时间，才摸到可以放的地方。我将那对铜制大烛台塞在搁码头的条石底下，沉没在水下，并将细麻绳系在顶住条石的一根木桩上。第二天，我把藏匿那对铜制大烛台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用借来的凿子凿着大床前床架上雕刻的龙凤，每凿一凿子，父亲嘴里就骂一声造反派“不得好死”。龙凤凿完，父亲哭了。父亲说，当年雕这些龙凤，花了好几斗的米钱，现在被强迫凿掉，作孽呀。

家庭会开过没几天，大队造反派真的挨家挨户搜查了。搜查到我家时，造反派首先查看了我家大床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有否凿掉？当他们看到龙凤已被凿掉后，其中一个造反派就问我母亲：“听说你家还有一对铜做的大烛台没上缴？”我在一旁听后顿时吓出了一身汗。

我母亲则说：“听说？听谁说的？我家就这么大的地方，能把那烛台藏到什么地方？你们可以搜。搜到了，我被你们斗批。若收不到，你们赔我一对大烛台。”

见母亲说得不慌不张，三四个年轻的造反派就信了母亲的话，没搜就走了。等破“四旧”的风头过后，我才把藏在河边码头一块条石底下的那对铜制大烛台拿回了家。

学校里没什么“四旧”可破了。再说了，高年级的红卫兵同学，也组织起来

到常州、江阴、无锡等不太远的地方大“串联”去了。我们不是红卫兵的同学，你想去学校就去，不想去就待在家里，反正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了，也没有老师管（不敢管）我们学生了。

已是暑假开学的时候了。由于学校里不考试，取消了升留级，六年级的学生没有毕业，大都外出“串联”去了，因而学校停招了小学一年级新生。这可把该上学的孩子的家长急坏了。我们村有家人家的儿子，已10虚岁了，因不能上小学一年级，使家长因急因气而骂起了娘。他（她）不敢明言骂“文革”，只是隐晦地有点指桑骂槐地骂造反派。

我去了几次学校后，因学校里不上课，又没多少同学，也就不去学校了。正是农闲的时候，恰是农村破“四旧”的大忙时候。于是，在我同村的几个小伙伴的鼓动下，我们就跟着我们村上的造反派，去观看大队造反派破“四旧”。

大队造反派破“四旧”，是有计划进行的，今天是个哪个生产队，明天是个哪个生产队，谁家为重点，谁家是一般走过场，他们是早有安排。造反派每天上午8点前都要到大队部集中，由造反派头儿布置任务，然后整队出发。造反派中大部分都是男的，女的没几个，左臂上都戴着红卫兵袖章。他们有的手里拿着绳索，有的手里拿着木棍，有的手里拿着一头尖尖的长约2米的铁矛。他们手持这些家什，是为了便于抄家，便于对抵制破“四旧”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在队伍前的第一个人，手擎一面红旗，红旗上印有巨轮大队、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字样。

大队造反派到达某个生产队后，先在生产队打谷场上集中，高唱《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在造反派高唱《造反歌》的时候，引来了围观的人群，他们看着很激昂的造反派，嘻嘻哈哈。半大不小的孩子则学着唱“滚他妈的蛋”。唱完《造反歌》后，造反派头儿进行任务分配，然后开始破“四旧”。

我们大队共有13个生产队，除第8、第9两个生产队破“四旧”任务特别重外，其余11个生产队的“四旧”没几天就被破完了，因为这11个生产队是贫下中农占绝大多数，中农很少，富农更少。而小沙上村的第8、第9两个生产队的地主、富农、中农占全村总户数比例不小，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村的富裕人家较多。因此，大队造反派在这个村破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四旧”，收缴了好多丝的、绸的衣服、被面，金砖、金条、首饰、铜银器皿，皮鞋、高跟雨鞋；砸坏了好多瓷的、玉的器皿，雕刻着龙凤的长台、八仙桌、太师椅等；烧毁了不少字画和古书。

造反派把收缴来的东西，堆放在打谷场上，再用石灰粉围绕堆放物划了一圈白线，当作禁区线，除造反派可以进入白线内外，任何人都不得（其实也不敢）

进入白线内，白天，有造反派值班；晚上，有造反派负责守夜。

破缪秀琅家的“四旧”，持续的时间最长，折腾得最厉害。因为，缪秀琅的丈夫陈荣度，是逃到香港去的反革命分子。据说，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若陈荣度逃不掉，就一定会被人民政府抓到后枪毙。陈荣度逃走时，除留给缪秀琅丰厚的家产外，还留下了一双女儿。土改时，缪秀琅的家产，被人民政府没收去了大部分，还被划分为地主成分。土改后，缪秀琅靠劳动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同时，陈荣度还不时地从香港寄钱寄物回来。因此，至“文革”前，缪秀琅和两个女儿，还是过着安定、小康的日子，惹得村人眼红羡慕不已。

因为缪秀琅家的成分是地主，属于剥削阶级，按照“文革”的逻辑，其家里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特别多，因而，大队造反派对其破“四旧”时，也就特别“革命”。他们先把缪秀琅的一头乌发剃掉了一半，留着另一半，这在当时叫“阴阳头”，是侮辱人的一种常用的方法。然后再将其五花大绑，逼着她缴出金银财宝。缪秀琅像“牙膏”，被造反派“挤”一下，她就吐一点实情。在她家除抄到丝绸被面、衣服和一些字画、古董外，造反派还撬开她家地板、敲开她家墙壁，从地板下面、墙壁的隔层中间，搜到了好多金砖、金条和首饰。缪秀琅家的“四旧”被破完，缪秀琅也被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造反派在“破”缪秀琅的时候，也把其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十八九岁，一个十六七岁）给“破”了。“破”的花样是：先把缪秀琅的两个女儿的长辫子剪掉，然后强迫她们穿上缎子棉袄（在公历9月），再逼其用菜刀，将陈荣度从香港寄回来的高跟鞋、高跟雨鞋的鞋跟扞掉。

两个女孩子流着泪，抹着汗，艰难地扞着皮鞋跟和雨鞋跟。几个男造反派则流着涎水，傻子般地望着貌若仙女的两个女孩子在接受“文革”的“洗礼”。不知是因大热天穿着棉袄被热的，还是因受屈辱气不顺，没扞多久，其中一个女孩子就昏过去了……

破“四旧”，破坏的是国家的财产和公民的财产，破除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立”起来的，则是愚昧，则是无知，则是兽性。

【编读往来】

王立嘉谈 48 期

48期首篇谈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章，文前介绍作者86年生。作为文革过来人，我曾感到怀疑：如此年轻能胜任这种研究吗？读了文章，觉得确有功力，在材料方面做足了功课，其见解令人信服。文革研究出现这样的生力军，令人欣慰

不已；而扶持推扬年轻力量，是值得称道的长远眼光。本期介绍的《红叶满地》、《文革在山西》和《“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极有价值。如不读《昨天》，我就不会知道这种重要的书讯。希望你们以后经常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方面的成果，许多只能在海外出版，一般人无缘知晓；而《覆灭记》这样的书即便在国内出版，因涉及文革便敏感，媒体也不太会宣传报道。有的著作即使难以读到（如海外出版的），知道出版了这些书也是好的。

萧白杏谈 48 期陈闯创文

读《昨天》第 48 期，我感到欣慰的是，有“80 后”的青年也开始研究文革了，而且发现了我们这辈人都还没思考过的问题，可见研究之深入，文革研究终于后继有人了。看来中国的历史不会断代了，历史的真相终会拨云见天。

庞国义谈陈闯创的疑问

陈闯创先生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见《昨天》第 48 期）一文中，对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中所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提出“尚有疑问，待考”，应该说是严谨审慎的。成立于 1966 年 11 月 9 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肯定不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仅以笔者所知，重庆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成立时间就远在此之前。

在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最近编的《口述重庆文革》资料中，参加口述的原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杨国成（成立该组织时担任司仪）和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朱登明等都确认“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是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宣告成立的，时间是 1966 年 9 月 30 日，先于上海“工总司”一个多月。只不过当时建立了组织而未建立完善的领导机构（不像上海“工总司”那样一建立起来就有了个“司令部”），重庆工人造反军在 1966 年 10 月中旬赴北京“北上告状”后，在重庆的留守人员才正式建立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北京的北上人员中分裂出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11 月里其他北上人员返渝后又不服从已经有的司令部，而另外建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造反军总部的建立大约比上海“工总司”稍晚一点。